

Graduate Institute of Building and Planning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城鄉通訊

夏季號

NO. 28 JUN. 2022

專題報導：疫情與後疫情時代



▲台大校園一角 摄影 | 陳泓羽

建築與城鄉研究所通訊

創辦人 毕恆達

發行人 陳良治

指導教師 王志弘

封面插畫 鍾智豪

美術編輯 陳泓羽 / 榮嘉蕾

文字編輯 林佳蒨 / 秦沐涵 / 陳泓羽 / 榮嘉蕾

雜誌投稿 ntubpnews@gmail.com

編輯室報告

2022年《城鄉通訊》6月號是本屆編輯團隊負責的第一期作品，首先，先讓我們自我介紹一下，新任的編輯團隊由4位R10的同學擔任，分別是秦沐涵、榮嘉蕾、陳泓羽及林佳蒨。未來一年的刊物，將會由我們負責採訪編輯的相關工作。團隊成員皆為刊物編輯新手，尚有許多未注意的缺漏之處，還望各位讀者多多包涵，若有任何關於內容的指教及建議，也歡迎來信(ntubpnews@gmail.com)告訴我們。

回到本期《城鄉通訊》，封面乃委託R10鍾智豪同學繪製，封面故事呈現出本期專題報導—疫情與後疫情時代。在圖的中央是兩台電腦合成的機器，比喻網上會議縮短了生活距離。線上會議看似與人相隔很遠，但其實有了網際網路，整個世界千里如一米。

台灣在2021年受到疫情的衝擊，生活一度偏離了正常的軌道，在全民齊心抗疫之下，而後進入了後疫情生活。2022年雖疫情再起，但當社會再次面對嚴峻疫情，城鄉之間，似乎都有了自己面對疫情生活的新方式。在這樣的脈絡之下，我們進行文稿的徵集，最後選擇了兩個特別的視角在本刊中進行呈現。作者們以自己的生活為原點，講述著大環境下普通人的日常分別是疫情防控下的疫苗接種站，以及在疫情的驅使下，傳統市場展開與外送平臺的合作，這樣的新嘗試也意謂著傳統市場正在進行著數位轉型。

教職員訪談的部分，我們邀請到了高郁婷老師，她對自身的學習歷程與經驗進行分享，並給予在學的學弟妹們極大的鼓勵。另外我們也訪談到在所辦短暫任職的林佑針，她也是城鄉所的學生，我們了解到作為在學學生，在所辦工作的心路歷程及挑戰。

編輯部與城鄉放送局成員—王麒愷進行了深入對談，在校友洄流的文中敘述了他的人生故事，玩樂團、做電台、跑社運、做案子，從原本的社運咖，最後卻到公部門工作，麒愷所呈現的大概就是所謂「協槓青年」的樣子吧。

本期還紀錄了兩場演講，分別是邱啟新老師的「日常生活的綠住宅」，以及吳杰穎老師的「水患與空間規劃」。前者乃配合碩一實習課主題—合作住宅而生。啟新老師提供了讀者們反思在台灣可以如何實踐這樣生活方式及可能遇到的困境；後者則是由陳亮全老師的「城鄉安全與防災」課程邀請到北市大吳杰穎老師帶來分享。台灣雨量分布集中，在這樣的氣候特性下，引導讀者們從空間規劃者的角度出發，可以如何有效地減災。

最後是自由徵稿部分，本期投稿文章的內容相當豐富多元，文章所談的主題都非常新穎特別，從原住民部落衝突到香港鼠疫、上海封城、日本性產業皆有涉獵，值得讀者們一一細讀。

城鄉通訊編輯室

2022.06

目錄

專題報導
疫情到後疫情時代
的生活觀察

01 編輯室報告

- 03 疫苗接種中心的「重實作」與「微觀察」
 08 滑手機就能逛菜市場？台北傳統市場參與外送平台的經驗

教職員動態

- 15 高郁婷：「懸置，打結，與刪除號」
 19 林佑針：我的工作歷程

演講紀實

- 22 吳杰穎：水患與空間規劃
 26 邱啟新：日常生活的綠住宅

校友迴流

- 34 王麒愷：「從社會運動走進公部門，遊走各種角色的轉譯者」

自由徵稿

- 43 封閉式社區「牆」難拆：上海疫情所呈現的全景敞視
 48 香港鼠疫和異質地方：港英政府的太平山區防疫政策
 54 異質空間—大阪飛田新地與大和性史節錄
 60 我們的家園不是你的避難所：以 Taromak 部落為例

▼貨櫃搭建的臨時問診間 摄影 | 陳品嘉



疫苗接種中心的「重實作」 與「微觀察」

◎ 撰文 陳品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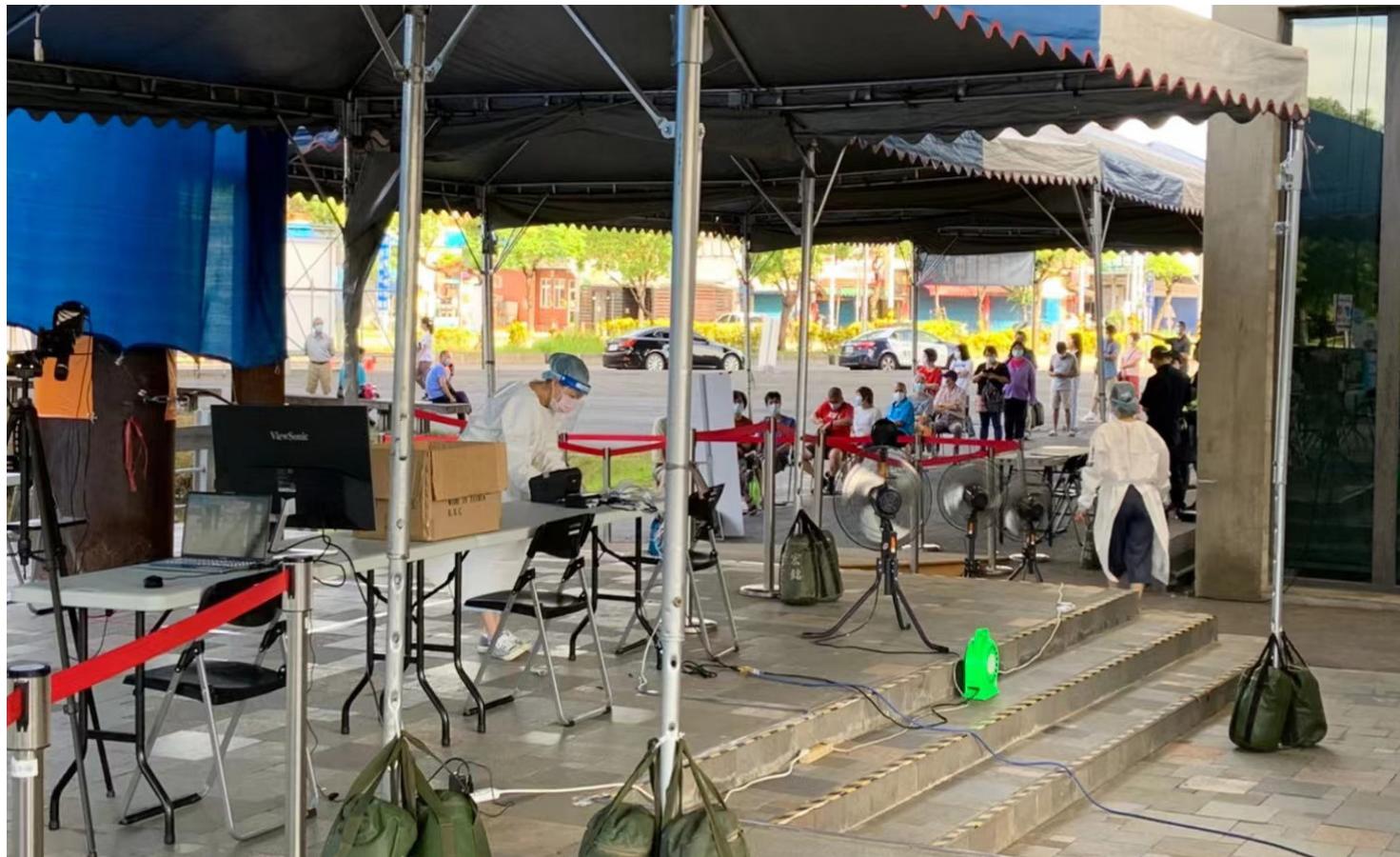
前言

近日台灣的疫情不斷地升溫，雖然專家學者指出疫情已經進入高原期，未來可能有趨緩的趨勢，但就目前的情況來看，全台灣依然壟罩在病疫的愁雲慘霧中。病疫帶來的社會恐慌，體現在社會的不同層面，與疫情最直觀的防疫用品尤為明顯。從最一開始的「口罩之亂」，到中期的「疫苗之亂」，再到最近的「快篩之亂」，反映社會大眾在面對未來的不確定性，極度的尋求當時可以強化自身免疫的方法。

前述提及的「疫苗之亂」，為去年(2021年)五月全台爆發三級警戒的社會現象，社會大眾多半尚未接種疫苗，因此對於每日確診數 200 至 300 人深感畏懼。不知是否是因為疫苗接種率達一定比例，與現今每日確診數介於 60000 至 80000 人次之間相比，社會的恐懼並未如此明顯。總之，我於去年疫情處在風口浪尖時，受親戚的懇託，前往位於羅東鎮的溪南疫苗接種中心協助，主要擔任前台掛號與指引民眾接種的工作。除了純粹的協助醫療體系的運轉外，也順勢進行近似於研究者的參與觀察，從一位與醫療工作毫無相關的人，藉由固定時間的場域實作，並以自身主觀的感受與客觀的覺察，感知身為第一線醫護人員的作業流程和行政困境，以及室外的大型疫苗接種中心的空間配置。後文為我於 2021 年 7 月至 8 月的實地經驗與感受之彙整，主要可以分為身體、空間及社會互動三個層次，後文將逐一以我個人經驗予以詳述。



▲羅東文化工廠一隅 摄影 | 陳品嘉



►民眾於接種站外排隊等待入場 摄影 | 陳品嘉

身體：揮汗如雨的真實體驗

去年夏日，疫苗陸續到貨，各地施打的作業也紛紛展開。為了因應龐大的接種人數，也為了舒緩衛生體系的人力困境，衛生局以志工的名義，招聘在地民眾前往施打地點協助整體作業流程。如同電視上看到的，每一位在醫療院所空間的醫護人員，身著白色防護衣，頭戴水藍色防護帽，配戴口罩的重要性就不再多言。這些緊貼身體的配備，也是身為接種志工的我的標準衣著。

每天早晨七點半準時出現在接種中心，打開手提電腦的作業系統，迅速著裝等待民眾們進場等待接種。通常，早晨的氣溫偏屬溫和，縱然萬里無雲，但也不至於會使人感到燥熱難耐，但這種身體感受，到了中午就急轉直下，這和後續提到的空間有很大的關係。簡言之，位在羅東鎮的溪南接種中心，

設置地點選在羅東文化工廠這個大型的公共空間，即使處在室外通透的環境，但熱風迎面的夏日，在室外逼近 35 度的高溫下，仍令眾人感到無比難受，這樣的天氣已經讓蒞臨現場接種的民眾感到不適，更何況是穿著白色防護衣的志工群，為了降低染疫的風險，不得不以密不透風的方式阻隔與外界的接觸，致使防護衣之下無完好乾燥的衣料，全是被汗水打濕的痕跡，不僅影響到志工們的舒適性，也讓志工們的情緒處在起伏不定的狀態。每當工作結束，我和同事們都會在更衣室互相比較誰的衣服比較濕，來判定當天作業的認真程度。有一位大學三年級的弟弟，就急忙脫下他的上衣，現場扭動早已分不清原衣深淺顏色的上衣，奮力一扭之後，水滴便從衣服中湧現，令在場的志工都自嘆不如。



▲疫苗志工的衣著 攝影 | 陳品嘉

空間：具備臨時性與機動性的公共

前文有提及，溪南接種中心位在羅東文化工廠，在地人對於該空間的俗稱為「菜瓜棚仔」，因為外觀酷似種植絲瓜的棚架而得名。文化工廠空間主要有室內與室外兩個部分，室內是提供展覽演出、青年創業、及藝文講座等使用，而室外則是可以作為戶外舞台，或者是供民眾休閒育樂、長者社團聚會等用途。此外，在羅東鎮地狹人稠的空間中，文化工廠是在市區少有的大型開放空間，在整體規劃上有寬闊的動線，以及便民的停車設施，因此，政府在規劃設立戶外大型疫苗接種空間時，文化工廠成為首選之地，其原由顯而易見。

歸因於疫情之緊急事件，使得空間的用途不再只是限縮在單一功能，公共空間具備這樣的彈性，可以藉由其本身的臨時性與機動性，針對現階段遇到的困難進行相對應的處理方法。這種空間轉用的型態，在大型災害發生時更為常見，如每當颱風或洪水釀成災難，大型的室內體育場館或社區活動中心，經常轉為提供因災無法返家之災民一個安身立命的空間。同樣的，疫情也屬於社會災害的一類，社會性的問題難以透過個體解決，需要尋求一種具備集體特性的應變策略。

對此，公共空間之公共性，因為處理及復原災害而生，也許我們可以說，讓公共真正浮現的原因，社會災害與風險成為誘發的因素之一，也讓一般在探討公共空間常出現的劃界問題，於此時有了淡化的趨向。總言之，緊急避難空間提供的公共性，是值得後續深究的有趣課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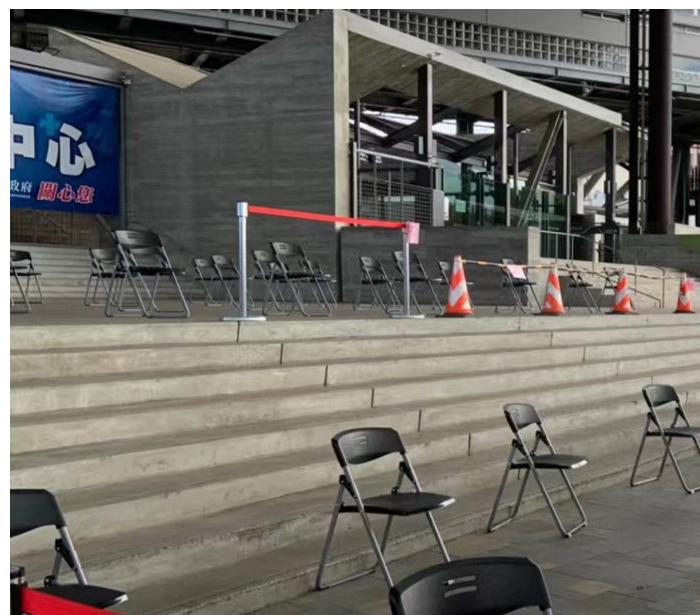
社會互動：簡單的一分鐘

與診間問診的醫師、注射的護士不同，前台引導的志工們是引導民眾進行施打流程的關鍵。志工的正確作業會使整體的施打速度提升，當然，這立基在前台良好的社會互動與對話上。因上級單位的造冊名單有所不同，每天前往施打地點的民眾有十分多元，除了一般網路預約的民眾外，還有老師、警察、計程車司機、瓦斯業、旅宿業等百工百業，更有身心障礙學員及外籍移工等，因此，縱使每天給予的指引說法相同，還是會因為對象的差異而有所改變。

從接收到民眾的健保卡，到民眾離開掛號台前往等待席，差不多就一分鐘的時間。而在這一分鐘內，必須要對民眾進行簡單的問話，例如近期有沒有感冒或發燒、吃藥打針會不會過敏、有沒有B肝帶原等等，過去還沒有深刻地感受到俗話說的「一樣米養百樣人」。然而，光是第一天的施打作業就讓我深刻的體認到前方俗諺的力量，需要根據個人的語言習慣，盡可能地調整自己的問話方式，從接收到民眾的健保卡，到民眾離開掛號台前往等待席，差不多就一分鐘的時間。而在這一分鐘內，必須要對民眾進行簡單的問話，例如近期有沒有感冒或發燒、吃藥打針會不會過敏、有沒有B肝帶原等等，過去還沒有深刻地感受到俗話說的「一樣米養百樣人」。

然而，光是第一天的施打作業就讓我深刻的體認到前方俗諺的力量，需要根據個人的語言習慣，盡可能地調整自己的問話方式，用以達成雙方都能理解的成果，即使如此，仍有時候會面臨到一些棘手的民眾。他們擁有自己的堅信的立場，並且嘗試說服志工們相信他的所言不假，但志工們確信必須要依照正確的流程行走，也竭盡所能地與其溝通，能夠聽取建言者則不繼續頑固，若無法接受者則悻悻然地離開。

這些溝通都是建構在志工們的耐心上，但炎熱的天氣難免會影響到個人的情緒，諸多抱怨也會一擁而上，固然眾多繁雜的情緒令人惱火，志工們卻仍堅守崗位不與民眾們計較，不希望因為個人的問題影響到全場的工作氣氛，大家都秉持著相同的想法，互相體諒彼此的感受。總的來說，在前台看似簡單的一分眾對話，背後其實是醞釀許多複雜心理問題。對此，「簡單的一分鐘」也讓我有了反省自己機會，試著以他人的角度思考問題，同理面對似乎才是化解紛爭的解方。



會有本文的產出，其實早已醞釀多時，但一直沒有適當的時機發表（雖然有一部份的原因是因為個人怠惰……）。恰巧，城鄉通訊的夏季刊的主題，是希望撰寫有關「疫情到後疫情的城鄉生活觀察」，受通訊編輯團隊的邀稿，在兵荒馬亂的學期末撰寫此文，也藉此督促自己把這篇未完成、差點胎死腹中的文章，重新回到我的書寫視線之中。大抵而言，這段生活觀察經驗，是凝縮兩個月的志工體驗，再加入一些個人的感想與反思。我透過身體、空間與社會互動的區分，嘗試將這兩個月的參與實踐進行歸納，另外，我將題目以種實作與微觀察，意在彰顯身體實作其實是遠大於用眼觀察的份量，更進一步地說，就算我用再多的文字描寫當下的天氣炎熱、汗水淋漓、民眾的緊張情緒等，都難以超越那時那地、直接面對環境還要來的真實。綜此，如同質性研究強調的田野概念，要理解社會內部的問題是什麼，最重要的核心概念，不外乎是直接進入田野現場，實作的重量將會遠遠超乎純粹位居一旁觀察的想像。

最後，希望疫情盡快結束，世界慢慢步入正軌，祈願社會無災無難。



▲疫苗施打完畢的觀察區 摄影 | 陳品嘉



滑手機就能逛菜市場？ 台北傳統市場參與外送平台的經驗

◎ 撰文 郭書璋

那天，我來到市場採買日常下廚所需的食材，不少攤位上除了擺放自家蔬菜、肉品外，也多放上了外送平台的LOGO。攤商們表示，現在除了上菜市場外，在家裡也可以透過手機下單選購。2021年5月，本土疫情再度爆發，許多民眾擔心出門採購增添染疫風險，選擇透過電商平台，訂購平日所需的食物。與此同時，以餐廳小吃為外送主力的平台業者，也拓展其業務，與傳統市場合作，來宅配生鮮蔬果。同年7月，北市府也訂定補助方案，輔導轄下市場攤商，上架各大平台系統，藉此推動數位轉型。不過，要讓習慣於線下交易的傳統市場，同時也要有效的回應線上的訂單的需求，那麼勢必改變市場攤商長期以來工作模式。進一步來說，傳統市場與外送平台，都有一套既有運作的邏輯。市場攤商靈活挪用現場的互動，來經營人情味的交易關係。外送平台則透過即時性的跨時空服務，來快速賺取利潤累積。所以，當兩者必須連結、重組，就必須要磨合。那麼，他們是如何相互接軌，形塑出所謂的數位菜市場呢？



▲傳統市場的 Uber 取餐區、在傳統市場取餐的外送員 資料來源 | 臺北市市場處

當外送平台搶進傳統市場

看準疫情時代民眾對於線上購買生鮮雜貨的需求，以及低度使用數位平台的傳統市場，UBEREATS 於 2021 年 4 月起，陸續與傳統市場合作外送；在同年 7 月，FOODPANDA 也宣布投入其中（商業週刊 2021）。在合作模式上，相比於與一般與餐廳與小吃攤的熟食外送。首先，在費用上，不收取上架費與月租費，且每一攤的服務費抽成，也從原本的 35 % 降為 20 %（上下游 2021；聯合報 2021）。再來，為減低市場攤商對於數位技術上的適應，平台業者也派駐小幫手至現場協助。

小幫手就是日常協助攤商，收取線上的訂單，幫忙撿貨、理貨的人員，其目的就是要讓攤商能單純專心準備貨品。接著，為了保有來傳統市場買菜的客製化服務，業者從 APP 介面設計，讓民眾可以直接點選，如去骨、要切等。最後，攤商也可以每週調整品項與價格，若貨源不足，也可以透過小幫手來關閉該品項。

臺北市政府這幾年亦透過政策導引，來推動傳統市場的數位轉型。不論是要求加裝無現金支付系統，或將既有的悠遊卡系統，增添數位交易的功能（台北市政府，2021）。

這股數位轉型的政策方向下，2021年7月，市府宣布與外送平台合作，投注4200萬的補助，每一攤每月可補助25%到50%的外送服務費，至多五千元至一萬元，為期半年，來輔導市場攤商上架外送平台（台北市市場處，2021）。

疫情的爆發更加劇了對於數位工具的依賴，擴散到生活每一個環節。政府與業者，也透過各種方案，來試圖導引原本難以被數位化的社群。本文接下來透過兩個不同類型的傳統市場，分別是地區型的C市場，以及擁有廣泛知名度的S市場（兩市場皆化名），來討論他們是如何與外送平台相互接軌。

邁向數位菜市場

C市場：外送平台是生意熱絡的來源

C市場於日本大正年間所設立，80年代初曾進行改建，將其與圖書館、警察局等市政服務設施，共同整併置此多功能大樓；原本一、二樓規劃給市場所用，但攤位數量少，後僅有使用一樓（台北市市場處2018）。C市場和外送平台合作，是在2021年4月份，當時平台業務前去市場登門拜訪，探詢意願。不過，起先反應並不熱烈，最初只有約十多攤左右的願意嘗試。疫情爆發後，未加入攤商看到參與平台者業績大幅提升，後續也都陸續上架。

對於C市場而言，外送平台就是市場生意活絡的來源。幾位攤商表示，市場平常來客量少，特別在夏季的期間，只能用淒涼來形容；後來和加入外送平台，成效意外的好。即便年紀稍長的攤商，直言對於數位工具難以適應，但仍對於外送平台所帶來的效益，感到非常的驚艷。對於外送平台的高度熱切，目前C市場中，已可以看到各家外送平台，在市場設置理貨區，讓外送員可以順利取貨。

總之，從C市場的經驗可以看到，外送平台得以落地於傳統市場，原因是有一部分攤商願意嘗試，且確實感受到平台對於收益有所幫助，進而滾動更多攤商投入參與。於是，這也讓C市場的攤商們認為，外送平台是活絡市場的來源。

S市場：審度使用平台的生意人

S市場為90年代初，市府整頓部分攤販集中場，所興建的市場（台北市市場處2018）。S市場曾經在攤商與市府的努力下，改善基礎管線問題，以及環境整潔，來打造出毫無異味，且乾淨明亮的消費場所（2018）。另外，他們也嘗試採取諸多創新的措施，如與設計團隊合作改造攤位美學，因而獲得「全台最漂亮傳統市場」的美譽（2018）。有攤商是這麼描述，「我們市場其實有點介在傳統市場和超級市場銜接之間。」



當 S 市場確定與 A 平台（化名）配合外送服務後，不久之後另一間平台業者，也來詢問是否有合作的意願。不過，同時有兩間外送大廠進駐，這就讓市場自治會更謹慎的思考，這真能促進的生意？自治會幹部認為，還是希望保持市場的人流，認為現場交易互動更能創造非預期的消費，外送平台只是附加而已。對於外送平台有更審度的立場，也在 S 市場多數攤商身上看到。不過，這並非出自於數位能力的不足，所產生的猶豫。其實他們多使用多元的數位工具，來靈活地銷售。

例如，有些攤商將自家的貨品，上架至其他網購平台；或建置 LINE 的官方帳號，經營各種群組。在訪談的過程中，他們都可以說出一套加入或不加入平台的原因，例如貨品要優先保留給熟客；或是提出該怎麼用不同的工具，來彼此相互搭配。



▲市場與 Uber Eats 合作 資料來源 | 臺北市市場處

當平台與市場相遇

當平台要進入市場，會由平台的業務和自治會，或是部分態度較為積極的攤商接洽，來做討論，並牽線市場其他意願攤商。平台業者表示，通常會規劃一套合作方案，包含如何帳款的拆分、提供哪些服務或優惠，來與傳統市場討論。另外，平台方也會確保傳統市場上架後，是有辦法在線上獲益，也會要求有不同的品項、明確的規格資訊，來拼組成來讓民眾願意購買的線上菜市場。不過，生鮮往往會因為貨品的特性、時價的變化，而難以給予一個標準化的規格。攤商們表示，這時候就勢必改變菜單，放棄變動較大的品項，來符合平台線上交易的邏輯。所以，我們可以說，外送平台接軌傳統市場，就是要將利潤想像相互接軌。外送平台必須提供更優惠的條件與服務，來吸引攤商加入。同時攤商也會觀察，使用平台是否能夠獲得期待的收益，才能持續的參與。反之，市場方也必須提供多元的品項、明確的規格資訊，才能讓平台方有利於在線上銷售給更多的消費者，

除了接軌利潤想像外，更重要的是如何讓兩邊的工作節奏接軌。多數攤商對慣於現場即興的交易買賣，對於數位工具的使用有其挑戰。為此，平台派駐小幫手至現場協助操作機台，收取訂單；另外，也置專屬的空間，來讓進行檢貨、理貨的工作。換句話說，這就是市場接受訂單服務與出貨的轉運節點。

也讓外送員可以至單一的地點取貨送出，不用在市場中一一和攤商交涉，使得食物能更有效即時的配送。在我訪談的過程中，不少攤商都提及，就是因為有小幫手，才願意加入。所以，小幫手即便看似只是一份簡單的工作，但他確實讓慣於現場交易互動的攤商，能夠與平台的消費者連結上。

不過，即便有小幫手的協助，當面臨訂單倍增之時，也會使攤商手忙腳亂，一邊應付現場客人，同時也必須準備線上的訂單。有的攤商調整自身的工作流程的速度，來做因應；有的攤商選擇退出部分平台的合作，來面對翻倍的業務量。

結論：

工作節奏與利潤想像的相互接軌

從台北傳統市場參與外送平台的經驗可以看到，若要將兩邊相互接軌，就必須要接軌彼此的工作節奏與利潤想像。當外送平台要進入傳統市場，就必須面對一群對於數位平台陌生的市場攤商，於是提供小幫手服務，或是各種優惠合作的方案。同時市場攤商也必須調整，了解平台系統的運作，才能有效與平台協作。如改變販賣的品項，以及調整工作的節奏。畢竟除了要服務現場的客人，也要顧及遠在雲端另一處看不見的客人。

從 C 和 S 市場的案例可以理解到，即便是被認為難以數位化的傳統市場，攤商仍機智且有彈性的，來因應各種可能發生的變化，並呈現出不同接軌後的型態。長時間不斷求新求變的 S 市場，攤商們各自有慣用的數位工具，或是認有更適切的銷售方式，對此採取更為審度的態度，自治會也採取有限度地開放外送平台。所以即便有平台的引入，攤商們大多認為是「附加的」，並非當作是市場生意活絡的源頭。C 市場作為一座近百年的區域型市場，當有部分攤商使用外送平台，而有驚人的銷售成果後，也紛紛帶動其他攤商的投入參與。所以，即使兩座市場都成為數位菜市場，我們看到在 C 市場中，與外送平台接軌與整合的程度，是比 S 市場還要來的大。



參考文獻

上下游, 2021, 〈外送平台比一比：熊貓、Uber Eats、Lalamove、Cutaway，誰對餐飲店家最友善？〉。<https://www.newsmarket.com.tw/blog/152614/>, 取用日期: 2022年07月12日。

台北市市場處, 2018, 〈傳統市(商)場〉。https://www.tcma.gov.taipei/Content_List.aspx?n=0D7AE96417D828CC, 取用日期: 2022年07月12日。

台北市市場處, 2021, 〈傳統市場轉型注活血，北市府4,200萬補助推外送服務〉。<https://>



▲傳統菜市場一角 攝影 | 林佳蒨

www.doed.gov.taipei/News_Content.aspx?n=F28B775DFA6D1A44&sms=72544237BBE4C5F6&s=85652A741A1E96C7, 取用日期：2022年07月12日。

台北市政府，2021，《臺北市後疫情時代產業數位轉型政策白皮書》。台北：台北市政府。

商業週刊，2021，〈一張單，UberEats 可能要和 7、8 個攤商銷帳！為何還搶進傳統市場？〉。
<https://www.businessweekly.com.tw/business/blog/3007786>, 取用日期：2022年07月12日。

聯合報，2021，〈盼擴大客群救業績 外送業者進駐北市公有市場〉，08月12日。

台北市市場處，2021，〈北市傳統市場 2.0 生鮮蔬果外送一指購〉。https://www.tcma.gov.taipei/News_Content.aspx?n=AC4FE820872E03E6&s=F365AF5BA0F7C8B8, 取用日期：2022年08月01日。

高郁婷老師于 110 年開設了兩門課程，分別是第一學期的「文化創意產業專題」，以及 110 第二學期的「空間的社會分析」。近日編輯部對她進行了訪談，並邀請她與編輯部分享了她的個人故事，以及未來的研究方向。

「懸置， 打結， 與刪除號」

高郁婷

◎ 訪談整理 榮嘉蕾

「在城鄉所中產生的印象轉變」

在考大學的時候我申請了兩個系所，一個是建築而另外一個是外文，後來因為申請上外文，所以大學就來讀外文了。再後來那時候由於在臺大這個環境裡面，與建築比較有關的專業就是城鄉所，另外一個是園藝系的設計組，所以那時候其實兩個地方我都有去修課。與此同時，那時候的我發覺城鄉所的課程跟我一開始想像中的建築相關系所會有的樣子不太一樣。我當時覺得怎麼城鄉所這邊的人在講的事情，不是我們一般想像中的空間，而是在講很多社會的問題，所以大概在這個時期發生了對於城鄉所印象上的轉變。

後來大學畢業後，我是先出國才再回來城鄉所就讀的。其實一開始沒有想要把城鄉所的這個碩士讀完，但在進城鄉所之後發覺曾經在大學時期，還有國外讀碩士的時期受到的一些刺激，似乎剛好是在城鄉所讀碩士的那個階段才有比較好的沉澱下來。那時候也有去修王志弘老師的課，沉澱之後好像就覺得可以靜下心來想想看，到底自己是不是比較適合做研究，或者是當你發覺自己可以對於社會上的一些議題，有一些新的切入點的時候也是蠻有趣的事。

在英國讀碩士的時候，沒有預想到當時我進去的那個系，剛好帶我的老師是我之前沒有接觸過的左翼批判路線的，所以真的發生轉變是那個時間點。與其說就讀之後產生轉變，不如說



▲ 供圖 | 高郁婷

當你慢慢的走向了一個研究取向的那條路，你就要去「思考」。這個思考不是隨便的思考，而是要更謹慎嚴謹的思考。你需要去多讀一些其他人的東西，然後再去跟他對話，這樣下來會對你如何認識自己，如何認識世界產生很大的影響。

那位英國的老師叫做 Loretta Lees，專做縉紳化研究，在國際上頗為知名。她是我 2012 至 2013 去英國 King's College London 讀 Creative Cities 這個一年碩士學程時的學程 co-ordinator。她當時在 KCL 的地理系，但一年後似乎就去了 University of Leicester 的地理、地質與環境學院任職。我讀的那個 creative cities 學程是地理系和 CMCI(Department of Culture, Media & Creative Industries) 這兩個系合開 (cmci 那邊的 co-ordinator 是 Andy Pratt, 是我名義上的指導教授)，但這兩個系的 co-ordinator 沒過多久就都跳槽到別的地方了。可能因為這樣，這個碩士學程沒再繼續，在 KCL 似乎是個前無來者，後無古人的學程 ..



▲去峰區尋《傲慢與偏見》 供圖 | 高郁婷

我當時有修一門實習課，在 Loretta 引介下從旁觀察了倫敦南華克區象堡的一個在地左翼組織。象堡那有個神奇的現代主義風格購物中心，與議會集合住宅（council housing），但地方政府想要把它拆了蓋可以賺錢的住商大樓。雖然政府主張會要求建商將部份單元作為社會住宅或可負擔住宅出租／販售，但我們也知道，那租金絕對比原本高很多。在 2010 年那段地方政府大搞都更的時代（2012 年倫敦奧運也造成一波居住權抗爭），南華克的案例不算稀奇，但對當時的我而言完全是以前沒想過的議題。我沒能做什麼，但畢竟親眼看到了組織的參與

者、他們辦的展覽、他們的社區合作社，以及那個對當地非裔和拉美裔而言十分重要，我看了也備感親切（很有臺灣的非正式氛圍）的購物中心。

我說自己的實習是「從旁觀察」，原因是，我還真幫不上什麼忙，組織也不清楚我一個突然冒出來的學程學生可以做什麼（英國制度一學期也就三個月而已）。他們最後勉強給我的工作是，幫忙把網站上的資訊翻譯成中文：參與南華克區更新案的許多潛在地產商都來自國外，當中許多是中國、新加坡和中東資本，組織認為把資訊翻譯出來，是否可能讓那些覺得自己只是出錢投資的外

國人，更了解其中的利害關係，即他們新的投資型房產，是建立在弱勢者居住權的犧牲上。

現在想來，長期參與居住權抗爭的倫敦在地組織，應該是不會有這種過份天真的期待。他們應該只是硬想了個工作塞給我。儘管如此，對我來說，這就是開眼界的經驗了。待在英國時，還有其他很多令我開眼界的人事物。不過，也是因為如此，會越來越覺得自己是出去開眼界，不是去定下來。別人努力在為自己家做事，看了他們的作為後，會想自己能有所貢獻的地方，總不會是已經有人為其捍衛的倫敦吧。那個曾經你一無所知的地方，於是會開始向你展現連結。然後我人就回來了，走入城鄉所的篇章。

另外，儘管圖文不符，但我每次想到自己當時的英國經驗就會想到去峰區看到的景色，所以提供這張照片。這大概能呈現「開眼界」的意象。

「我的人生其實就是一連串刪除號」

刪除號的概念就是，大家覺得我很清楚我要幹嘛，但其實我不是很清楚我要幹嘛。我只是瞭解我自己是什麼樣子的人，那這個瞭解就是我是一個走刪除號路線的人。我不像有些人可能比較 affirmative，會很確定自己有一個什麼理念熱情，或者是說他這一輩子要成就什麼事情，但我比較不是這樣子的。我的路線通常反映著一些外在環境的變化，回到是不是一開始就想要走學術跟研究的路線，絕對不是這樣子的。我是很晚很晚才確定我要繼續讀博士，甚至是到城鄉所畢業的時候都還沒有確定我要讀，所以是很晚的。這個很晚其實就反映著剛剛提到的其實我跟各位一樣，可能你們也很迷茫，所以我當時也很迷茫，不確定接下來比較適合我的那條路可能是什麼。

英國那位老師她其實跟我不算是那麼的親近，但是她算是給我一個比較像是文化衝擊的那種感覺，她帶給我的是之前沒有聽過的東西。但是這個衝擊要轉換成後來自己的人生方向，也不是一蹴而就的。我是在回來讀碩士班的過程中跟老師做案子，確定了好像自己對研究算是有興趣，而且好像也還算會做研究。在這過程裡我也有去進行一些其

他的嘗試，像我也去跑去跟人家上班過，雖然時間很短，就是這樣子刪刪刪的過程，發覺我不喜歡上班，應該很多人都可以感同身受吧。雖然我不喜歡上班，但好像還算可以做研究，似乎做研究的能力好像還可以，更重要的是我也願意繼續做下去。做案子的過程裡面其實是能夠感受到一些樂趣並且獲得成就感，所以在這個過程裡面，就發覺我可以繼續讀博士。

不要覺得說好像前面的人都很厲害，沒有這回事。同樣也是把那個路徑刪一刪，刪到後面那個就走走看，如果真的走不通的話，當然就是另闢蹊徑，再看看有沒有其他適合自己的路。像是不清楚未來的路怎麼走的迷茫時期，所謂的迷茫其實會伴隨大部分人一輩子。即使說你好像也找到了一個看上去穩定的時候，那好像可以暫時沉澱下來，但通常在學生階段剛好是屬於一個「懸置期」，就是你的方向是什麼都還不是很確定，但同時好像又具有無限的可能性的時期。

「我的方向」

未來的開課方向將會跟我自己的研究興趣有關，初步延續我博士論文的關懷，去做城鎮與居民組織。比較是面對小鎮而不是那種都會的方向，是介於鄉村跟都會之間的那種城鎮。我以前是做彰化的研究，或許之後想要去做一些不同城鎮的對比。對我來說剛好這種介於都會跟鄉村之間的地帶，它可以顯現一個臺灣社會現代化過程，剛好是一個把那種正在轉變的過程給凝結起來的一個場域。從中大家可以看到像這樣的地方性社會，它是怎麼去調節它的生活方式，而這個調節其實會具體展現在像是他們的住宅形態，或是生活方式的安排。在 home and city 中，非常 Private sphere 的那個 home，跟比較 Public sphere 那種 city 之間，是不是可以從另一外面來看它。都市研究一般會比較在意公共性，或者城市的公共生活，我比較感興趣的是，如果從相對來說比較私領域方向來看，將會是什麼樣的狀態。

「想和你說的話」

不要待太久，能趕快畢業還是趕快畢業。我也當過學生所以知道當學生的好處，就是剛剛講那個懸置不決的狀態，一切都是 suspended 的暫停狀態，壞處是你看起來一事無成，但好處是到了無限的可能性。因為你什麼事情都還沒有做成，所以好像可能性都還存在，就是那個結還沒有打死，但其實很多事情好像你必須先往前進才能看到新的視野。如果一直停留在學生的圈子裡面的話，有些事情就是沒辦法看到。所以不要停留太久，早一點畢業，踏出舒適圈。

唸了城鄉所之後一路下來會經歷一個很大沉澱期，接著去奠定學術上的研究能力，這不僅是一個積累的過程，也讓我對自己奠定了一定的信念。應該說這也是一個「慎思明辨」的過程，用現在小朋友會講的就是「獨立思考」。大家都覺得獨立思考很重要，但獨立思考到底是什麼？可能有些人會說：不會「人云亦云」。但當然也不是這麼簡單，而是你對於這個眼睛所看到的世界，以及社會上很多複雜的事情，有能力去做一些「判斷」。這個判斷可能仰賴你原來就瞭解的一些東西，接下來也要有能力去做一些資料的收集與分析，去瞭解這個資料背後意味著什麼，最後去做出自己的一個價值或立場的判斷，擁有這樣的判斷能力，就擁有了獨立思考的基礎。

以上的 ability 是大家出社會其實也用的到，雖然有時候可能有一陣子會有一些痛苦，就比如說你在研究時候把腦袋變得清楚了，但是回到職場進入社會的時候，發覺那是另外一種邏輯。有時候像是你的公司或是你的老闆，迫於業績的壓力，不會要求你把事情講清楚，其實重點是交差，大家也許不期待你要把事情講得怎麼明白，重點應該是交出一個什麼東西。這個東西是否真的是很好的東西，或者是有邏輯的東西，不見得是當下你的上司會要求的。像這樣的職場中的狀況，可以看做是另外一種運作方式。回到你在城鄉所學到慎思明辨的能力，雖然說它許多時候會被壓制，但也不是輕易會被其他人帶走的。



林佑針：我的工作歷程

◎ 訪談整理 林佳蒨

佑針在 2021 年 12 月到 2022 年 4 月之間於所辦擔任行政助理，她也是城鄉所的學生，目前正準備畢業。一起來看看佑針這四個月的工作歷程！



▲佑針生活照 供圖 | 林佑針



Q 學姐當初為什麼會接下這個工作？

A 一切都是剛好，剛好我要準備畢業，剛好王老師找我來。不過老師原本是找我同學，但我同學不想再做行政了，所以就跟老師推薦我。

Q 接下這個工作的動機是什麼？

A 我逆來順受，有什麼我就拿什麼，不過如果那時候有其他事情要忙的話我可能也不會接。想說短期之內沒有要做什麼事情，就接了。

Q 學姐的工作內容是什麼？

A 工作很多很雜。

▷ **學位考試：**相對簡單，負責所有學生的計畫書和論文考試的作業。

▷ **準備各種會議：**會議要打議程草案，最後要打會議紀錄，開會的時候宣讀提案

▷ **院務會議的調查工作：**最麻煩，要去問老師、問學生做資料的統計。

▷ **公務信箱：**信箱會有人寄信過來，遇到不知道該怎麼解決的問題，就要重新詢問。

▷ **排課：**要去詢問每個老師預計開什麼課程，是排兩年的課程。

▷ **招生：**如果要口試的話，要寄通知給學生，準備文書作業。書審成績和考試成績出來要先給老師們看，看完之後再排口試時間。舉辦完口試再統計老師的成績送到研教組，這很重要，這和學生的未來權益有關係，所以我會檢查很多次才把成績送出去。

▷ **環安衛：**要做消防演練等等的，平常東西壞掉也要負責處理。

▷ **網頁維護：**需要一直維護，隨時更新。

▷ **其他：**做行事曆、雙聯學位、雙主修等等。



Q 覺得所辦的行政工作會很辛苦嗎？

A 辛苦是人際關係上的辛苦，要聯繫人，這是最麻煩的，因為不知道哪一句會踩到別人的地雷，很需要細心，如果漏掉就需要去補救、去道歉。



▲採訪進行時 供圖 | 林佳蒨

Q 這個工作有什麼挑戰性嗎？

A 這個工作的每件業務都是一點點，但是累積起來就會變得很多很雜。之前看過一個說法，一個人一次最多能記的事情是 5 到 7 件，但這個工作顯然已經超過一次最多能記的事情了。所以很需要每天筆記要做的事情。

Q 學生和所辦員工這兩者的身分有什麼不同？

A 學生和老師的關係是有點上下級，所辦和老師的關係是平行的。雖然話是這麼說，但我還是沒那麼容易抽離，因為我很崇敬各個老師。

Q 對之後想做這份工作的學弟妹有什麼建議嗎？

A 先把論文寫完再來，因為上完班就不會想寫，回家就想休息。如果不寫論文的話，是個養老的好地方，可以修養身心靈。

水患與空間規劃

◎ 講者 吳杰穎
演講紀錄 林佳蒨
演講日期 111.04.06

吳杰穎教授簡介：

學歷：美國德州農工大學都市及區域研究博士；國立臺灣大學建築與城鄉所碩士

現職：台北市立大學城市發展學系暨研究所副教授

專長：都市計畫、都市防災、環境行為與規劃、都市更新、氣候變遷調適與永續發展規劃

“

Katrina 颶風對
空間規劃設計者有何
啟示？

”

本次演講是陳亮全老師因應「城鄉安全與防災」課程需要，因而邀請到吳杰穎老師進行演講，演講聚焦於水患與空間規劃之間的關係。吳老師也畢業於城鄉所，近年來主要從事防災、韌性城市等相關研究。



▲ 演講現場 摄影 | 林佳蒨

今天的演講吳老師從紐奧良（New Orleans）的都市發展開始談起。紐奧良於 1718 年於僅高於海平面 5 英尺的密西西比河旁建城，1840 年成為美國第三大城市，當時為了都市的發展，而排掉了沼澤水進行開發，卻也種下了後來受到颶風嚴重威脅的種子。1910 年，整個城市的排水系統及抽水站建置完成，並沿著湖旁設置堤防。2005 年，紐奧良遭到卡崔娜颶風的肆虐，造成市區 80% 淹水，損失慘重。為什麼卡崔娜颶風會對紐奧良產生這麼大的影響呢？吳老師提到紐奧良有七成的面積低於海平面，四周以堤防保護。由於暴浪河水洶湧，沖垮缺少維修的河堤，導致內陸湖湖水湧入紐奧良市區。他也提到另一個重要原因由於紐奧良長期都市發展不當，與水爭地所造成的後果。

這次的災難也對空間規劃者有了啟示，紐奧良不當的都市發展是造成嚴重災情的重要原因。堤防的興建雖然提供都市一個暫時的保護，可以延後受災時間，但卻擴大災情。災後的紐奧良也面臨到是否重建的課題，美國眾議院議長是反對重建的，但似乎大多數的人支持重建，因為紐奧良擁有重要的爵士樂文化。不過重建後的原住戶只有少部分的居民回到紐奧良繼續居住，其餘都已搬離當地。吳老師試圖從紐奧良的經驗帶出一些思考：什麼原因會造成水患？怎樣的都市發展能免於未來遭受災損呢？我們將視角從美國拉回台灣，反思我們所生活的台灣又存在著什麼樣的問題，以及如何防患水災的發生。

在台灣，水患的成因主要分為三類：

(一) 破紀錄的雨量

莫拉克的單日累積降雨來到了 1400 毫米，佔年雨量的一半以上，中南部山區發生嚴重水患。然而不只在鄉村地區，台北市大安區也在 2021 年 6 月 4 日出現時雨量 209mm 的大豪雨，造成市區多處淹水。因為台灣短延時強降雨的氣候型態，我們應該更重視水患問題。

(二) 與河爭地

吳老師也提到紐奧良排乾沼澤水進行都市開發，這種與河爭地的情況在台灣也經常出現，例如過去的太麻里溪河道在娜拉颱風侵襲後，政府將河道截彎取直重新築堤。但與河爭地也很容易造成嚴重災害，廬山溫泉區在 1980 年代大量業者湧入開發，河川行水區也跟著大幅縮減。

(三) 都市化的開發

土地開發前，降雨大部分會經由滲透入地底，貯留於地下水層中。但在土地開發後，因為不動產的興建，大量減少地表被綠地覆蓋的面積，縮短集流時間，增加洪峰流量，造成低漥地區的淹水機率增加。

在了解水患的成因之後，吳老師接著分享我們該如何減災

減災措施的分類有結構式減災和非結構式減災。以台北市為例，二重疏洪道就是典型的結構式減災，主要以堤防興建和排水工程的方式，保護緊鄰河岸周圍的地區。非結構式減災則是吳老師在演講中有更多著墨的部分，它有兩種類型：

(一) 資訊揭露 / 風險溝通

資訊揭露的第一步就是公佈災害潛勢圖，讓民眾可以清楚知道自己身處的地方是否有任何的災害風險，若有，可以提早防災。而防災社區的重要性是當社區每位居民都具備強而有力的防災意識，那麼在面對災害時，就有能力降低災害帶來的衝擊。

(二) 空間規劃手法

空間規劃是空間專業者所能夠做的非結構式減災手法。例如：徵收高災害風險區土地 / 容積移轉、避開高風險區 / 降低開發強度、綠色基盤設施、低衝擊開發 (LID)、建築物的設計、落實都市計畫策略等等。



▲吳杰穎教授 攝影 | 林佳蒨

最後吳老師以洪患平原之父—Gilbert F White 的話作為結尾：「洪水是上帝的作為，但洪水的損失主要是人為的行為。」（Floods are an act of God, but flood losses are largely an act of man）這段話傳達給我們一個重要觀念，當水患造成了災害損失，很大原因是因為人類所導致的後果。因此我們應該做到的基本原則是降低人造環境的脆弱度，而空間專業者則可以進一步透過空間規劃的方式降低水患帶來的災損。

日常生活中的綠住宅

◎ 講者 邱啟新
 演講紀錄 秦沐涵
 演講日期 111.04.08

邱啟新教授簡介：

學歷：美國紐約市立大學環境心理學博士

現職：國立台灣大學建築與城鄉研究所副教授

專長：建築與都市設計、環境行為與心理、都市政治生態學



一、綠住宅在英國：當前面臨的限制和挑戰

英國一度計畫在 2016 年以前，開始通過建造的方式改變，使所有新建的住宅都在 Zero carbon strategies——零碳戰略之應用下達到沒有產生任何淨碳排放量的程度，因為所有環境污染、空氣污染、碳排放太多都會造成不友善環境。傳統的營建製造方式，從澆灌生產到整個新建過程會有很高的碳排，更不要說後續用水用電的使用，這些都會造成很多傳統能源的消耗，這些都是碳排的來源，所以說營建產業是碳排很重要的一個來源。英國現在的碳排有三分之一是來自於住



▲山西黃土高原的窯洞住宅外觀 來源 | 邱啟新

宅，建築或土地使用中的種類有很多（住、商等），但最多碳排的來自於住宅。所以英國希望在 2016 年的時候可以達到「碳中和」，「碳中和」指房子產生的碳排必須跟他們減少的碳排達到一個零。房子產生的碳排包括電力、熱水、各種照明等等，建造的住宅進駐後不太可能不產生這些消耗，所以減損會通過建造時的碳淨能源包括風力、水力發電或者太陽能等來達到目的。一正一負、一加一減之下，只要最後的結果是零，這個房子就可以開發。

英國認為在遵循這個原則下去的話他們的都市可以不斷地成長，土地開發可以不斷地持續，不影響經濟，在這個狀況下只要可以維持算式的中和，都市就不會因為成長或開發而越來越走上不永續。

但英國政府在 2016 年過後不久就宣佈全面廢止此政策，該政策後續引發了很多開發商、營建產業、建築師的反對。它創造了很多的成本是用在開發很多高效能源的有效性上，比方新的住宅必須配備再生能源的設備，這些東西會增加很多的電費造成房價的上升。他們認為在追求居住正義的同時，卻以 Zero carbon 這個政策去促成了很多高價化的住宅，這樣的低碳住宅是一般人負擔不起的價格，因此這類住宅變成一種很理想化的存在但它卻不務實，與日常生活是脫節的，對科學家和政客來說是一個美好的願景，迫使我們去做更多的再生能源產業的發展，但是卻造成最基本的人的居住權卻被壓縮。減少能源的消耗、減少碳排、透過節能手段以及改變居民的生活方式來達到目標，使用很多有效的建築物，建築物要導入再生能源的設施，若是依舊達不到標準，開放商就會額外購買碳排的補償來達到碳中和。從整個系統來說，它所描繪的明天的願景並不是 2016 年可以達到的，關於未來人們是否可以達到這種生活方式學者們透過 Zero carbon 的失敗也提出很多警訊。



“

追求綠建築究竟是一個「真實」的東西 還是一個「奢侈」的東西? ”

真正要做出一個 new home 去符合能源有效性是一個綠色的創新，這需要很多系統的配合。結合實習課來說我們在做合作住宅空間的 program、剖面或者配置，首先我們要做到從屋頂的隔熱建材開始，使用能夠高度隔熱降低室內溫度的建材，在美國的一些城市，可看到建商開發的屋頂塗料以白屋頂取代了難以維護的綠屋頂，這種特殊的化學塗料其實也為化工製造商帶來新的商機。每個國家和每個企業都開始進行製造聯盟公私合夥，有企業的支持會推出相對應的住宅政策，不用綠化而是通過化學的方式，但也是以抗暖為訴求，又或者是現在的防疫建築，標榜隔絕 pm2.5 隔絕病毒細菌，但這些東西都會耗能。整個系統都是相當耗費成本同時還要有特殊的生活方式去配合。

目前國際上對於所謂的零碳或低碳住宅已經有一個大致戰略，台灣必須要回應與思考我們的城市有沒有需要去做這樣的改造。在看待我們自己的城市時，對比德國、英國的城市，我們有很多的鐵皮屋、違建、狗皮膏藥，這些貼貼補補的東西成為了我們的地景特色與現實。這些呈現出台灣城市堅韌不拔的生命力，長處無限的可能性，造成再現的空間與生活的空間一種很大的差異。我們有很多社會科學理論可以解釋這些現象，當回到環境層面上這些成為都市的現實時，綠住宅不得不回應這些日常生活的空間實踐。綠住宅不會只是在雜誌、畫刊或是作品集裡讓大家翻到看到的設計，它並不是不存在，但它不是發展中國家與東亞國家的常態。



51

▲ 本演講投影 攝影 | 陳泓羽

二、台灣發展綠住宅的瓶頸

曾帶領學生去過山西黃土高原的窯洞住宅，這些古人留下的住宅具備了現在綠住宅大部分的條件，它非常的隔熱降溫，也有大量的具體綠化，整體環境冬暖夏涼。曾經我們的住宅是非常貼近日常生活的，是人類文明在地智慧自然演變出來的，可是我們今天的社會需要用很多設備、技術、規章、計算公式去衡量住宅。建築設計的本質是在適應環境，但人與自然的相依和組裝的特性其實是建築的本質。工業革命之後的現代建築，讓自然原生的綠住宅慢慢消失，我們才需要用很多方式去拼裝量產它。在理解了綠住宅的生活性後，我們必須去面對四個台灣發展綠住宅的瓶頸現實，第一個就是我們還是高度仰賴高碳經濟的社會，對高碳排的依賴是台灣在綠色環境上轉型的巨大阻力，高碳排是台灣經濟的主要來源，製造業還是台灣經濟的主力，我們無法要求社會零碳生活；第二個台灣能源高度仰賴進口，發展綠色能源另一個現實考量就是台灣電力短缺，獨立電網、電力短缺只能靠自己，電力需即發即用，因此無法大量儲存，能源短缺屬於國安產物，它是被政治建構的；第三個是在地氣候與環境治理的需求，都市的不保水造成梅雨季節的淹水，都市韌性過低，這同樣也是因為大多數住宅沒有去回應到永續這個議題；第四個中古屋比例很高，都市代謝速度緩慢，建築不止是一個社會構造的集合體它同樣是人們生活的家園和日常生活的場域，因此都市代謝並不是一蹴可及的。

中古屋的存在帶到 co-housing 這個議題中，其實也在處理中古的再利用如何去回應到社會需求與綠色需求，如今國際對於建築的綠化開始朝向綠色改造（green retrofit）的走向。



▲ 窯洞住宅室內一隅 攝影 | 邱啟新

三、在台灣城市，綠住宅可能嗎？

由於之前在做高雄的綠能導向違建治理的研究，因此對於住宅綠能化的發展比較關注的是對即存建築的改造與綠能化的議題如何和居民生活現狀結合。這樣的思考在目前綠建築的發展裡面其實是缺席的，國內業界從 1999 年就一直在申請綠建築標章到現在指標都未曾改變，這些再生能源項目都是大量沿用日本或歐美的指標，很少去檢視台灣達到這些指標上的困難度，這種指標掛帥的綠建築政策限制了台灣的建築發展很長一段時間。

到了 2010 年，再生能源發展條例出現後，這個所謂比較全國性的標章能源建築才開始慢慢地方化。從能源局的「陽光屋頂」百萬座計劃開始，有一些地方政府開始有綠住宅的計劃，開始類似仿效歐美的零碳住宅但是以局部的方式去做。比起歐美地區台灣大概晚起步十到二十年，但是在過去十年間，還算密集的是在 2012 年到 2019 年陸續出現了一些地方政府主導的綠住宅的條例和鼓勵辦法。在這些辦法中都比較強調誘因，例如高雄的綠建築自治條例，通過綠能設施引進容積的方式去獎勵建商開發這樣的住宅；台中市的宜居建築也是用免計容積加上回饋金的方式去鼓勵及規範住宅去增設綠化或綠能化的設施。但是對於中古屋，我們能夠做到的在制度面上還是很少，新舊住宅有很明顯的斷裂，慢慢我們對城市的永續化還是高度仰賴一些營建產業為了申請標章獲得容積所做的個案。

我們的中古屋真的沒有綠色改造的潛力嗎？這些發展潛力其實是真實存在的。以 co-housing 為例，潛力來自於屋頂空間基於現行的法規屬於約定共用部分，它屬於一個住宅的公共空間，我們實習課中所做的案子大都屬於國有宿舍，產權與使用權都相對單一，其使用可以由所屬單位和現有住戶來決定，它可以創造社區共享的綠色平台。但問題是大多都有屋齡較高的問題，同時年久失修，維護管理需要很多的成本和技術，我們也不太清楚這些宿舍未來的命運是什麼，因此現在花錢做的這些東西到底能用多久，後續有沒有人能夠接受，都是一個限制。同時還有違建與佔用的問題，很多屋頂都有堆放回收的物品或者居民儲物的空間，所以屋頂實際可用空間就更顯稀少。所以在住宅綠色改造中結合潛力與種種限制之後，大概能夠形成四個可行的面向：綠屋頂、太陽光電、垂直綠化與社區共用空間。這些是一般台灣可使用的住宅綠色改造方式，在無法全盤使用數學的方式去進行計算也無法靠全套設備系統化走向綠色的情況下，先局部改造對於現行住宅的綠化其實是有效果的。

(一) 垂直綠化

露台及陽台綠化是現在能看到的住宅立體綠化的一種手法。大家走過工地都能夠看到綠色盆栽，全世界可能只有台灣的工地圍籬會做綠化，似乎成了特有的現象，開發的同時又做保育，覺得工地鐵皮圍籬不好看就把它用綠化的方式來修飾。但立體綠化運用到住宅它是可以做長期的，它可以通過區塊模組式的設計，像新加坡那樣用不織布的方式來做。它的難度與它的視覺效果成正比，如果想要看起來很全面而且效果強烈，它需要的構造就要先做出來。一般達到這樣的效果最大的限制在於做這些東西並沒有容積獎勵也沒有政府的補助，它不像光電板一樣有補助而且之後售電會有收益。這些綠化為什麼在台灣的住宅很少見？主要是因為它們沒有誘因，對住戶或者所有權來說沒有立即能夠看得到的效果，因此很難勸說住戶去

做這樣的改造。相較於視覺型綠化，住戶更青睞於實用型綠化，因為視覺型綠化很常來修飾開發商的開發行為，但是在生活中並沒有這麼全面而是採用比較務實的盆栽綠化做法。



▲ 綠色改造 攝影 | 陳泓羽

(二) 線屋頂

比較典型的屋頂綠化是要在地面覆土薄薄的一層再在上面植草，它會形成一個真正的屋頂層，讓屋頂變成不是混凝土或磚瓦而是植物，這就是所謂的「薄層綠化」。它經過一些設計美化後變成精緻的花園型，同樣它的難度取決於土壤的厚度，想做的越精緻豐富，需要做的覆土層就越厚，甚至種喬木的話需要有降板的處理。能種的植物種類也都不一樣，所以屋頂綠化的維護成本相對較高，但同樣它有作物的效益，可種植花果蔬菜、可食地景，因此這種方式受到現在中古屋的青睞，使用程度較高。

要思考在 co-housing 中種植植物的意義究竟是什麼。它的意義可能是可以培養社區的關係。很多屋頂菜園、屋頂農園甚至屋頂空地這些空間都是培養鄰里關係很重要的場域，藉由這些地景或園藝的活動自然產生 co-housing 需要的那種共用的生活和共有的價值觀。

四、屋頂綠化現存議題

目前在台灣確實有不少居民在屋頂做綠化，這些屋頂綠化存在的議題也不少。

第一個是公共性與使用權的爭議。有些居民會認為這是他的私地，從而衍伸到使用社區的共用空間，但是卻沒有回饋給社區。訪談過居民，認為屋頂綠化不同於鐵皮屋，它是可以在台灣的居住文化中被默許的一種行為。但綠地究竟應該屬於誰，在台灣這是一個具有公共性和公益性的議題。

第二個是薄層綠屋頂誘因不足，「薄層綠化」屬於難度高的一項技術。

第三個是永續功能不足，也是我們的屋頂綠化中現存的議題，即便是新建的集合住宅都只有很有限的室內降溫效果。

五、能源：屋頂太陽光電

普遍是利用屋頂與太陽能板，現行法規即便是有鐵皮屋，也是可以做太陽光電構架的，可直接架設在屋頂上。主要是為了推廣太陽光電，讓其數量再提升，台灣已放寬鐵皮屋架設光電板的規定。所以這些滾動式的修繕房屋方式造就了台灣的綠住宅，很大一部分也是因為法規的鬆綁。還有很多案例是從中古住宅出現的，比如高雄鳳山的台鐵宿舍大樓。它是一個只有五層五戶的建築，其實我們平時很少見到戶數這麼少的大廈，所以它非常快的就做成了太陽光電系統。住戶們討論事情更看重大方向，不會計較很多細節，他們認為看得到未來長期的潛能就可以。同時因為大樓住戶少，又沒有公共基金，所以每月支付的公共設備費用以及維修費用就非常高昂，所以他們一直在尋找替代性的財源

▼ 演講現場 摄影 | 林佳蒨



作為這些設備維護的基礎來降低住戶需要承擔的費用。這個案例告訴我們 co-housing 的概念在某些地方已真實存在，此個案就是一群有共識的、比較有遠見的住戶，能夠支撐綠住宅的構想而且合理的安排社區發展的效益，住戶之間的溝通有點像合作住宅的型態。

這就帶到一個重點就是公民電廠。現在有越來越多的社區或者公民在呼籲我們的社會因能源轉型引起很多環境不正義的現象，使得建築屋頂光電變成主要的施政方向，調升屋頂光電比例，降低平地光電比例，以減少與農爭地爭議。光電設備開始造在建築屋頂，雖然在這個屋頂上發揮很有限，遇到建造條件不錯的屋頂就會變成公民可以投資的場域。在過去的三到五年，台灣在北部出現了很多綠電合作社，比方說淡水忠寮社區。他們在當地有一個三兄弟，他們號稱是一個智慧綠能農村，在申請農村再生計劃裡面他們帶進了再生能源概念。在淡水這個地方有一個社區組織是淡水社大，後來它開始成立新北市智慧綠能合作社，目前是北臺灣最大的綠能合作社。在忠寮社區農村是由這三兄弟的住宅做示範基地，慢慢的去影響到其他的一些公共空間。

淡水忠寮社區的示範性的公民電廠背後的綠能組織其實是很多目前台灣現存合作社的一種模範，成立合作社其實不難，合作社應該是一個方法或者說途徑，我們成立合作社最終希望達到什麼目標才是重點，以綠能合作社來說，他們的前身都是一些非常有活力的社區組織。綠能合作社能夠成為一個很務實的方法，因為綠電合作社有一個靠天吃飯的本錢，光電板能夠擁有穩定的 20 年的收入，基本上產生的長期基金能夠讓組織去做任何想做的事情。這個組織對於地方創生而言會有很多的穩定的財源。

六、總結

基地的共用空間不能被遺忘，不能只是在談 building，這些戶外的 open space 在做綠住宅也是其中的一環。

我們要想實現生態又合作的建築還是要靠建築師整合各種可能性，要因地制宜的找出適合當地人的建築模式。台灣綠能化的過程中，比起蓋一個生態住宅，更傾向於光電化、設計屋頂以及半戶外的綠化。現在建築的方式會去回應台灣的居住文化就會產生景觀大陽台、錯層陽台的立面還有綠能車庫等。台灣住宅市場會出現綠住宅，但它成為開發市場的一種商品，變成一種架構的自然，人麼需要去用一定的成本去取得這樣帶有綠意的生態型住宅，就經濟面來說，是在房地產市場上透過一些市場交易的方式才能取得。

這是一種現實面，但是綠住宅是否一定會走向不動產市場開發上的一種商品？其實有另外一種可能，通過合理的建材和集資開發的財務模式去支持一個很溫馨的家。綠住宅不是只有房地產制式的高層住宅，它也可以是低層的，建築師發揮設計造型的一種設計模式。美國南方的紐奧良卡崔納颶風重建建築就是一個例子，當時出現了一個基金會，號召美國知名建築師競圖陸續重建給這些無家可歸的人們居住的新住宅，標榜用非常合宜、節能的方式來設計，比如使用紐奧良卡當地的木材打造等等，這可以降低他們的電費和財務支出，還災民們一個家。綠住宅在這裡成為了不一定是高價的，不一定成為奢侈品的這種商品。但後續因為氣候原因，這些合宜、永續、環保建材成了房屋腐爛毀壞的原因之一，因為建築師在設計的時候忽視了因地制宜。合宜跟永續是可以兼得的，但要扣著在地的都市脈絡與環境氣候。因此需要另外一種經濟模式去支持它基本的造價和社會性能，這是綠住宅必須面對的真實需求，這些也是我們未來必須要在空間設計中去思考的面向。

王麒愷

「從社會運動走進公部門，遊走各種角色的轉譯者」

◎ 訪談整理 林佳蒨



▲ 王麒愷個人照 來源 | 王麒愷

小檔案：

級別：R04

關鍵字：鹿港人 / 立志成為鹿港最斜槓的青年 / 搶救古蹟運動 / 台大地理系研究員 /podcast《阿禮之聲》台長 /《城鄉放送局》成員 /

* 鹿港小孩夢想中的工設系，卻迎來自我懷疑

我大學唸高師大工業設計系，一直到現在可能都沒有任何一個人會上城鄉所，不是說他們考不上，而是這不是工設系同學會選擇的方向。讀工設是我高中時初步的志向，覺得自己可能會適合這個東西。彰化北部很多工廠，高中同學也都來自這樣的背景，連帶著老師對於我們之後要怎麼發展，普遍都是往理工或醫學去走。我也就一直在我應該要唸電機系的環境長大。後來我很懷疑自己，高中的時候一直算物理化學，我原本是對這個東西很有興趣，可是後來變成一直在背公式去爭取高分，透過科學去理解世界的方式讓我在那個年代產生自我質疑。

但高中的我很喜歡畫畫，有一次我的英文老師跟我說你那麼喜歡畫畫，要不要考慮唸工業設計，因為這樣才開始去書店找設計相關的雜誌來看。工業設計就是產品設計，產品設計背後透露的是一種生活方式，這種生活方式是對當時住在鄉下的鹿港小孩看了會很憧憬的東西。原來我們可以透過一種工具讓生活變得不一樣。考上高師大後，我發現又是另一回事，校區在偏遠的燕巢，對一個彰化學生來說，大學校園的想像應該會像台大公館這種熱鬧的環境。我把工業設計想得太理想了，覺得它可能是一種藝術的表現，但班上很多技職學校畢業的同學，相對我的畫畫技術就沒有他們好。評設計作業的時候，老師會把最好的作品貼在右邊，最差的貼在左邊，我都在最差的那邊。我懷疑自己真的那麼沒有才華嗎？我高中的時候恨透了考試，為什麼到大學還要被排名，所以我一直很懷疑工設是否是我想走的路。我很認真做過的一件設計是大四的專題設計，我設計了電鑽，這個電鑽居然成為後來城鄉所面試時老師們對我很有興趣的東西。

* 拋開工設，擁抱音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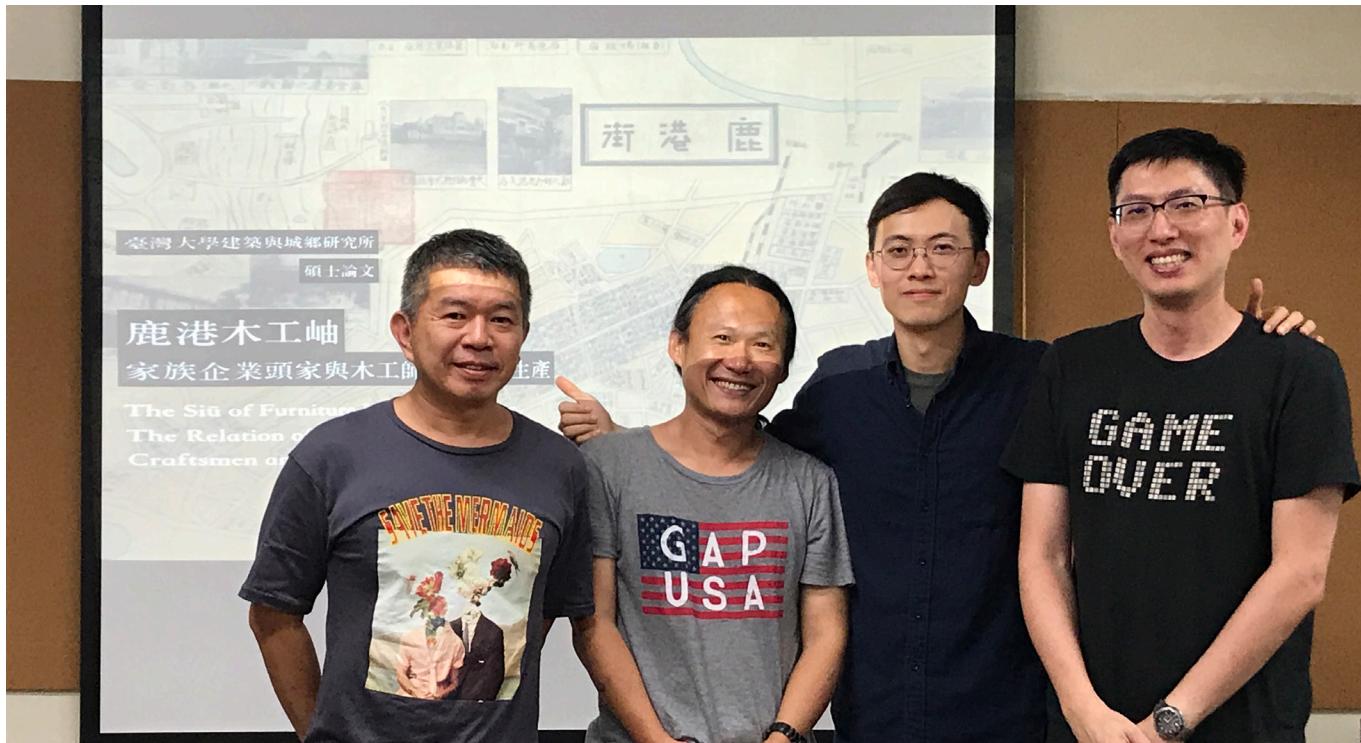
大學讓我真正找到重心的並不是工業設計，雖然我跟同學都非常要好，但是我隱隱約約覺得我好像不知道自己為什麼要做設計。當時遇到的專題課要做一個文化創意產業的設計，我做了一個非常政治不正確的東西，我對蘭嶼非常憧憬，蘭嶼最有名的是拼板舟，我把拼板舟做成一個杯子，上面用划船槳插在杯子上變成一個攪拌棒。但用現在文化人類學的角度來看，這是很奇怪的東西，我只是挪用了符號變成我的設計。可是這件事情在工設系不會被討論，老師只會跟我們討論形體怎麼符合使用機能或是量產。工業設計非常強調東西能不能量產，這是一個誕生在工業革命之後，歐美國家用來解決貧困的方式，讓貧窮人也能買到便宜的好設計，但在台灣完全是拼裝體。我一直無法理解為什麼我們在討論跟人那麼接近的物品，但我們對於怎麼使用這個東西背後的社會文化一竅不通。種種的原因，我在大學校園充滿了疑惑，也對這個系到最後失去了熱情。

大學真正讓我有熱情的是管樂團。高中面臨學測指考，壓力很大，我開始聽音樂，發現音樂很治癒，希望上大學之後可以繼續玩。在音樂的環境裡，我們的藝術形式就是一種自由自在的表現方式。我玩音樂玩到把工設系當作音樂系在讀，很認真研究音樂，除了演奏技巧之外，還有樂理、指揮等等，也修了音樂系的課。那時候我幾乎跑遍了所有高雄的音樂廳，連帶著我想去國外唸音樂相關的研究所。那個年代的我是往外看的，往彰化之外去看、往高雄之外、往台灣之外去看，我覺得最好的東西都是在國外。

* 當兵前的家鄉探索、318 學運： 由外逐漸往內看

大學畢業之後也遇到人生的抉擇，我不知道自己未來要做什麼，做設計也沒有到不喜歡，所以想說退伍之後去台北找一份設計的工作。我在鹿港等當兵的期間，因為喜歡攝影，所以每天都在鹿港拍照，也辦了攝影展。透過攝影的方式拍鹿港，我發現鹿港有很多素材可以拍，可是最後我發現鹿港一直在拆老房子，再蓋一棟不好看的現代建築。這件事情我是透過觀景窗看到的，但那時候我的學識只有到工業設計的思考，以工業設計的邏輯，這是一件奇怪的事情，時代在進步，但為什麼美學在退步？是不是代表我們當代人否定了過往時代的美學，這件事讓我想不透。

我在當兵時認識了一些在鹿港從事在地文化創生的朋友，大家開始關注公眾議題。但真正影響我覺得應該要了解地方的應該是「318 學運」。整個太陽花學運正在發生的時候，我在當兵，我每天站在營站裡面看電視，心想為什麼我不在現場。318 學運讓我比較衝擊的是這個社會結構之間存在了某一種文化上的世代衝突。在那個氛圍之下，我們開始討論我從來沒有討論過的公眾議題，但也漸漸覺得自己腦袋的知識不夠。受到朋友的引薦我得知了台大城鄉所，這個我以前從來沒聽過的系所。查了以後發現城鄉所好像在搞社運，而且能夠在台大搞社運，家人也比較放心。當時我看了一本王志弘老師和他學生寫的《文化治理與空間政治》，我了解到空間規劃在具有人文社會思考的情況之下，怎麼去擾動整個社會結構。



▲ 王麒愷與碩論指導教授康曼杰及口試委員們 來源 | 王麒愷

318 所擾動的社會有一種氣氛是我們開始覺得原來知識、專業工具或多或少可以改變社會，那時候有樂觀的感覺，讓我覺得我在鹿港的所見所聞好像需要改變什麼。那如果我今天去唸城鄉所的話，我是不是能夠有更強大的力量。我之前覺得工業設計是沒有靈魂在思考的工具，那如果我今天有靈魂、有思想了以後，也許這個工具可能是我可以拿來做點什麼的方式。

退伍之後就開始準備城鄉所的考試。面試我的老師是張聖琳、畢恆達、劉可強老師，我記得畢恆達老師對我的畢業設計—電鑽非常有興趣，我也常投稿憤怒的社論在鹿港的地方報紙《鹿港時報》，但不可能每天都在憤怒，我也喜歡寫古典音樂，讀了一些文化評論之後，就把古典音樂和社會當代性做討論，畢老師也對這個非常有興趣。口試完我就在台大拍了幾張照，我那時的想法是，不管我有沒有考上，以後去外面工作，我還是會繼續關心我生活的環境。

* 入學以後：在學院的討論中終於被理解

後來順利考上了，我在城鄉所讀了四年，後來我和同屆同學聊天的時候發現我們每個人都在彌補一段我們大學時期的慘白。同班同學有很多是當年 318 學運的參與者，我們那屆普遍有一種大家從社會運動的場合遇到遍體鱗傷，或是當下難以理解的事情，想要來城鄉所追尋某一種答案，或是想要認識更多同溫層。我記得我們第一堂課是自我介紹，我的同學都好酷，有南鐵東移、318、苑裡反風車、新竹舊監搶救，幾乎當時網路上看得到的議題，班上都有人參與過，大家進來的時候很像幾個孤獨落魄的靈魂在城鄉所重新聚集。我很感動的是以前沒有老師聽得懂我在想什麼，但進城鄉所之後，我很感動的是老師們都很願意跟我們聊心裡的疑惑，這是只有在學院才會發生的很可貴的討論，我們去討論什麼是專業、作為一個空間專業者，我們何得何能能介入地方、我們是誰，這些很本質性的問題，老師都不厭其煩的回答所有我們問題。



▲ 城鄉放送局在公館地下室 來源 | 王麒愷

* 《城鄉放送局》—社運與社區裡的放送者

我們實習課工作室在公館地下室，我們幾乎每個晚上都待在那裡。有一天我去公館地下室的時候發現有個同學在彈吉他，

在碩一的期末，學長姐在萬華東園社區辦了一個市集，知道我們在玩樂團，就邀請我們去表演，所以我們的第一場表演就是在萬華的東園社區。那時候我們還沒有自己的歌，所以都在翻唱別人的口水歌，我們唱了林強的〈向前走〉，舒楣老師事後在網路上寫了一篇文章，因為她聽到那首歌很有感觸。林強在1990年代寫的〈向前走〉是整個台灣城鄉移民非常重要的交叉期，那首歌唱出當地社區的心聲。碩一的寒假昱鈞約我們到每個人的家鄉走踏，好奇大家各自在自己的家鄉做什麼。我在進城鄉所之前，在鹿港參與了一個古蹟搶救的行動，一棟老建築「金銀廳」要被拆掉，那是日治時代望族的後花園，搶救金銀廳算是我第一期參與的社會運動。我的好同學來到鹿港，我當然要帶他們去爬金銀廳，金銀廳被建

麒愷：你等我一下，我剛好跟我台北的朋友借了一把長號，我來跟你對對看！

昀慶：你可以吹什麼？

麒愷：不然我們來吹〈港都夜雨〉。

對了之後發現不得了，我好像找到一個可以跟自己搭配的吉他手，昀慶找到一個他看得起的長號手，我們就在公館地下室一拍即合，覺得好像可以搞點什麼事情。後來發現我們班有一個同學他會打鼓，就是洪向，他的節奏感很好，他也進來了。後來另一個同學說他會寫詞，也學過一點中國笛，他也進來，就是昱鈞，我們四個人就這樣成團了。



▲ 城鄉放送局在實

商圍起來，不讓人進去，但對我們這些人來說，那個圍牆不算什麼。後來昀慶從金銀廳離開之後，在客運上面他的腦袋出現了一首歌，他覺得他應該要幫金銀廳寫一首歌，後來那首歌就變成城鄉放送局的第一首創作曲—〈凝望 1935〉。碩二的時候，我們一年大概有近三十場的表演，我覺得當時台灣社會很需要我們的存在。

很多社會的衝突都在那時候發生，比如我們很關注的反破遷，或者文化資產的議題，甚至是更多更大尺度的環境議題都烽火連天的在發生，每個地方都在開記者會、靜坐抗議、辦街頭宣講，所以我們全台灣到處跑，到處演奏，用音樂來鼓舞大家。城鄉放送局的時代，台灣其實有很多問題，我們用自己的方式去參與這個社會。

到碩三碩四的時候，大家開始出現新的焦慮，每個人都有自己關注的碩士論文題目和畢業期程，特別到碩四每個人寫完碩士論文的時間不一樣，那時候這個團有點像同床異夢的感覺，好像當初的感覺已經不在了，後來就越來越少演出。所以是在今年城鄉所的春酒是我們睽違兩年的第一次演出，我覺得很感動。城鄉所對我們來講，就像一班人生列車一樣，到了那幾站是那個狀態，可是過站了之後，可能又進入另一個生命階段。雖然現在不可能回到過去，但總會覺得城鄉所影響著我們一些什麼事情。

* 《阿愷之聲》—台語電台作為轉譯及認識地方的方式

《阿愷之聲》和放送局是一個總體計畫。因為從〈凝望 1935〉我第一次發現原來可以用台語去講一個故事，是可以變成藝術或是變成表演的。真正影響我想要開始做這個台語電台的是，我碩二做了一個北大都研所廖桂賢老師的社子島研究案，研究計畫分成兩塊，一塊是水治理，一塊是做人類學的調查。那時候我連社子島是哪裡都不曉得，但我就做了。廖老師希望能夠去挖掘更多社子島在地的聲音，去反駁檯面上看到的那些



習課基地「王公廳」的演出 來源 | 王麒愷



▲ 與客語歌手 - 米莎共同演出 來源 | 王麒愷



▲ 與客語歌手 - 米莎共同演出 來源 | 王麒愷

刻板印象和成見。我進到這個田野之後，對這裡深深的著迷。我在台北生活常常水土不服，一直到我到社子島之後，我發現這個地方就是台北的彰化，很難用空間規劃邏輯來思考，這個地方都是農地工廠，街坊鄰居很緊湊，居民自成一格創造出一些社區祭典。社子島的夜弄土地公會在淡水河邊辦一連串的市集，也會在那個地方搭舞台，辦猜燈謎的活動。康曼杰老師跟他們推薦城鄉放送局，所以我們碩二到碩四每一年的元宵節都會到社子島表演，我們真的是便宜又大碗，能唱歌、能主持，還能負責摸彩（笑）。

我會開始對台語有情感是因為我發現社子島人時不時就會遇到公聽會、說明會的場合，經常開到火氣很大，我覺得是由於雙方都不懂對方的語言，特別是學空間規劃的人經常用華語講專有名詞，像是自償率、抵價地等等，居民很多都是長輩根本聽不懂，但他們又知道這

件事情會危害到他們未來的居住，所以就會吵起來。我很常透過社區的報導人帶我去一些社區活動空間，他們知道我是台大的學生，知道我關心開發，他們會問現在是怎麼一回事，因為他們只聽得懂台語，所以我就會用台語跟他們解釋什麼是生態社子島、什麼是區段徵收。城鄉所帶給我很重要的影響是作為一個知識分子，或是作為一個專業規劃者，可以怎麼去扮演轉譯的角色，在專業者和一般的常民之間，們變成是轉化雙方語言的人，台語就可以是一種轉譯方式。康老師介紹我認識社子島溪洲底福安社（北管軒社）的李大哥，他提醒我其實鹿港有很多很難得的東西，才讓我最後想回頭去寫鹿港。《阿愷之聲》是透過在城鄉所所學的空間分析方法來寫我熟悉的地方，我想要用台語廣播的方式，因為我希望在工廠勞動工作的人也可以聽到。我一邊做碩論的田野，一邊把收集到的故事變成《阿愷之聲》的素材，這也是我和報導人之間培養信任關係的方法。

* 城鄉所畢業後：進入體制內的公部門和學校

畢業後遇到自己要做什麼的問題。當時我看到嘉義市政府都發處的職缺，那個職缺的內容是想要透過都市更新的方式，來討論嘉義作為日本時代重要的木都之後現今發展出來的都市問題。一般來說，普遍都更被詬病就是它一直是重建的方式，特別是在北部，重建以爭取容積獎勵，用最高的樓地板面積換更多的錢，但其實都市更新還有整建和維護。我對嘉義很有興趣，一方面是不熟，二方面是當時在研究自己的碩論田野，很多時候做木工的原料都會從嘉義來，那個地方在日本時代是阿里山林場，我想去那個地方看一看，看這個工作能不能延續碩論沒有完成的發問。我在嘉義市政府都更科待了快兩年的時間，期間辦了很多都市更新的案子，市政府想用劃定更新範圍進行整建維護的方式，改善這個地方的市容和居住安全。大家都認為都更就是重建，可是重建會抹除我們城鄉所會很在意的都市紋理。讓我矛盾的是，我又在嘉義市拆了非常多房子，嘉義市之後會出現更高量體的住商大樓，但嘉義真的需要這個東西嗎？蓋了大樓年輕人真的就能夠回來嗎？我很匪夷所思。

我在去年從市政府離職了，現在在台大地理系洪伯邑老師的研究室工作。想做研究者的工作是因為我在市政府的時候很多問題都沒辦法發問，比如我想知道這個城市真的需要這個東西嗎？或是嘉義市未來應該要是一個怎麼樣的地方？這個地方的人到底需要什麼？我在很基層的位置，這些問題是沒有空間可以發問的。研究計畫可以透過研究者的角度，去理解這個地方為什麼今天會長成這個樣子，可以有更多時間和空間去理解事情。現在在做阿里山茶葉研究，三不五時就要回到阿里山，我現在不是在阿里山，就是在要去阿里山的路上。也因為現在做研究工作比較有時間可以回來繼續做《阿愷之聲》。我想要成為鹿港最斜槓的男人，我覺得我好像沒有辦法一直坐在辦公室裡，沒辦法做額外的再生產這件事情讓我有點焦慮，所以想找更有彈性的工作。

城鄉所教我做人要善良

城鄉所四年對我來講是一趟奇幻旅程，除了城鄉放送局之外，我加入客語創作歌手—米莎的樂團，參與《百夜生》專輯的創作，那張專輯還在 2017 年入圍金曲獎，我去走了金曲獎的新光大道，我全身上下貼滿議題的貼紙，很多民間團體知道

我要走星光大道就連絡我們，希望幫助他們的議題可以在主流的場合曝光。參加完星光大道之後，隔天就去凱道參與反亞泥的遊行，我的生活就是時常在主流和非主流之間移動。

如果說城鄉所影響我什麼，應該是影響人格吧！我們雖然會對這個社會上很多事情失望，但時不時回想到城鄉所四年在討論的東西，我們會把它放在內心，也就是作為一個人要善良。城鄉所提醒我們用不同的反身性去思考，我們現在的專業到底能夠做什麼事情，以及這個當下我們是不是在做不好的東西。我以前的同事他們對於都市更新的工具非常熟悉，但是他們不知道自己在幹嘛。城鄉所給我們的視野讓我們有更大的尺度去思考，能夠去判斷下一步我們應該做什麼事情。我之後希望可以在彰化成立一間事務所，這個事務所可以包辦地方的所有事情，從土地買賣、政府的規劃案到文資提報。我還在摸索我在地方的角色，我從去年回來到現在，一直在思考我可以在彰化這個地方怎麼生存，這是個不容易的課題。



▲ 米莎 X 地下河專輯《百夜生》入圍 2017 年金曲獎的星光大道現場 來源 | 王麒愷

我想對城鄉所的學弟妹說：

城鄉所的學生不要害怕失敗，很多人可能會有台大或城鄉所的包袱。比如像我之前在社運場合很怕會遇到我不會的事情，或是居民問我的時候我回答不出來，但這件事情並不可恥，本來這個世界就很大，我們不可能了解所有的事情。另外就是解決事情的方式也不是只有規劃一種而已，如果今天我們城鄉所畢業，我們還是認為只能用規劃來改變世界，那很可惜。對丁組的學生來說，畢業之後應該去做一些實務界的工作，不管是公部門或私部門都好，試著了解過去比較屬於在我們對立面的那些人到底在想什麼，不用一開始就把自己退到體制的另一邊。如果我們真的要讓這個社會改變，就要知道這個世界上有許多人跟我們想的事情不一樣，先把自己的尖銳收起來，去看看其他人在想什麼，理解他們背後的欲望和生活之後，會有更不一樣的風景去看待以前那些覺得不可能解決的事情。

雖然有點濫情，但我覺得作為一個城鄉所的學生都要知道自己從哪裡來。我的同學很羨慕我是一個有家鄉的人，也理解到這是我很特別的地方，所以我的碩士花了一年的時間在理解到底自己的家鄉長什麼樣子、自己從哪裡來，我覺得在城鄉所可以回答這些發問，很值回票價。這個地方的可貴就是它沒有設定一個規則，每一次的討論都有每一次的建構和解構。到業界之後才覺得城鄉所這樣的精神是很難得的，因為在業界已經遇到堅不可破的土地金融、資本主義、空間規劃體制，這些東西不可能打破重新建構它。但是在城鄉所我們能夠從汙煙瘴氣的社會環境裡面撥出一條路，去問老師什麼是專業、什麼是規劃，這就是很棒的一件事情。

封閉式社區「牆」難拆： 上海疫情所呈現的全景敞視

◎ 撰文 韓禾(筆名)

一、前言

2020 年是疫情爆發的開始，轉眼間我們已經度過了兩年半的與疫共存的時間。全球在新冠肺炎 (COVID-19) 疫情的影響下，我們的生活方式與日常軌跡早已發生了改變，疫情為日常生活、全球經濟以及產業形態均帶來不小的變化。

隨著時間的推移，疫情爆發了一波又一波，從一開始的猝不及防全球全面封閉，各國封閉機場嚴禁人口流動，從根本上控防疫情；到長期的封閉後經濟不流通，帶來了通貨膨脹、全球債務風險加大、發展失衡加深等等問題。如今大部分國家與地區因為上述的問題，又或者是因為想要自由地呼聲、無法改變的現狀又或者是無法遏制的病毒的變異，或是別的許多因素，都選擇了解封狀態，讓人們做好自我保護。這其中卻不包含中國大陸。中國大陸一直以來都期待達到一種「動態清零」的狀態。而最近上海正因為奧密克戎 (Omicron) 的傳染速度而慘遭淪陷，整個上海地區的病例日日新增上千，於是國家下達命令，整個上海開始採取分區式封閉管理，自 3 月 28 日開始迄今已經分區封閉超過一個月的時間，目前正處於一個逐步解封的狀態。該事件在國際上鬧得沸沸揚揚，國際上眾說紛紜。本文中我們將從上海的封閉式社區空間模式以及分區式封閉管理策略來探討疫情期間的全晝化管控問題以及權力的運作。從 Foucault 的 panopticism 概念出發淺析上海社區的空間特質如何有助於國家施展權力關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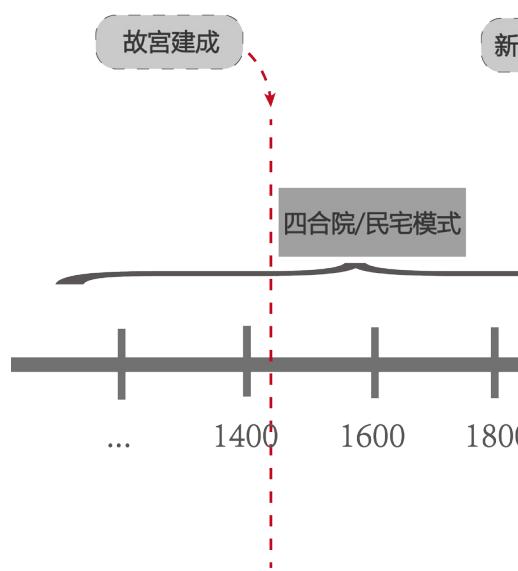
二、「小區」——中國式社區形態

對於中國古人的思想來說，有牆的地方才有家。縱觀中國源遠流長的歷史，其建築形態早在幾千年的發展中變之又變，但似乎我們總能從中找到相似的地方，那就是它的建構模式——封閉式。故宮，中國大院文化的核心代表，在這塊佔地 72 平方公尺的地方，故宮內院從小到大的層層相套，不止四周高牆森嚴，故宮還用護城河加強了對外的隔離。往小了說，就是京城建築的模板，四合院樣式的房屋。1949 年以後，封閉的大院成為了中國城市的獨特景觀：因大批幹部回到了城市中，住宅需求量急增，此時又受到蘇聯發展模式的影響，工業發展放在首位，出於節約成本與方便管理的考量，在空間上就形成了以單位為主要職能的生產空間和單位為輔助職能的生活空間所共同構成的單位大院，眾多大院連片的加蓋，大院成為了當時權力和身份的象征。後來隨著單位制度的解體，公有住房變私有（指可出售房屋），單位大院逐漸凋零，演變成具有門禁與圍欄的封閉式管理社區。封閉社區一般滿足的是住戶的私密性與安保性以及高品質性，因好的社區會配置周邊交通、教育、生活等一系列日常要求，因此高檔居住小區日益成為居民身份的代表。同時，小區的形成自始至終就是國家權力施展的重要單位，國家掌握土地所有權，包括這些看似私領域的住宅區域，封閉社區也就是我們現在一直所口語化的「小區」，而它們也成為國家權力實施的重要基層單位。

因此，可以說「小區」的建築住宅形式一定程度上滿足了居民對生活環境私密性和高生活品質的追求。「小區」是城市化的產物，尤其是像上海這樣的大都市，據 2021 年數據統計，上海小區總量已經達到一萬三千多個，小區這種住宅形式已經佔據了上海居民樓的大部分版圖。

三、疫情中的全景敞視主義管控

Foucault 的「全景敞視主義」(panopticism)，所代表的是一種權力對於人的監控，並且在某種程度上來說是對精神的一種磨滅。Foucault 在《規訓與懲罰》這本書中描述的十七世紀末城市出現瘟疫所採取的措施彷彿時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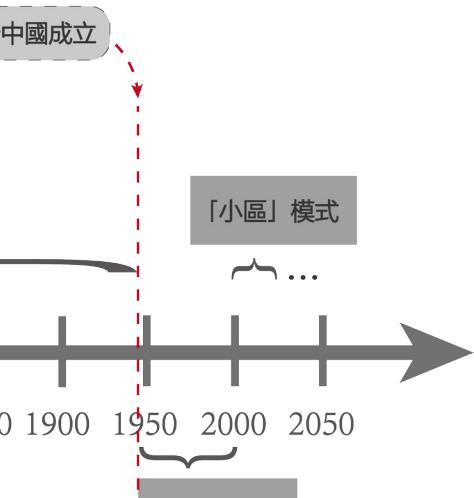


上海住宅小區數據概況		
編號	行政區	小區數量
1	靜安	1117
2	閔行	1214
3	青浦	503
4	崇明	223
5	松江	676
6	奉賢	446
7	長寧	988
8	黃浦	662
9	楊浦	1007
10	金山	288
11	虹口	759
12	嘉定	644
13	浦東	2668
14	徐匯	1178
15	普陀	680
16	寶山	829
/	合計	13882



重現一般出現在了上海。

Foucault 將出現瘟疫的地方形容為一個被割裂的、靜止僵死的空間，每個人都被固定在自己的位置上。如果他移動，就要冒生命危險，或者受到傳染或者受到懲罰 (Foucault, 1992)。



▲ 「小區」發展歷程圖
來源 | 筆者自行繪製



▲ 「小區」數據概況與分佈圖
來源 | 筆者自行繪製

(一) 上海小區全景敵視主義的呈現

面對此次上海疫情，「小區」這樣的中國式社區形態成為了方便管控的區域場所空間，它們本就是國家權力施展的基層場域，尤其在疫情期間其便捷程度在分區封閉管理的過程中甚至都不需要進行空間隔離，直接將小區內的出入口設置關卡，就能夠控制住一整個小區。為了實現「動態清零」，政府首先分區封閉小區，其次以小區為單位對居民進行網格化管理，在這期間施展權力，具體實施到每一位居民的登記、監視與劃分。面對疫情，上海政府先後採取空間隔離、監視與確認機制、逐層登記體制、最終徹底清查陽性居民。疫情期間嚴格的強制隔離（這裡指的是那些並未感染的居民）行為並沒有受到法律的制約，事實上，國家為了能夠確保權力滲透到每家每戶，建立起一個完整的網格網路，在管理與控制上，採取了最原始的方式，那就是一窩端，深入到日常生活中的細枝末節中——封閉小區大門，居民禁出家門。

權力在政府對人民的監視中體現的一覽無遺。在這個過程中，我們可以看到國家對政府下達命令；政府開始分區管理上海，分到的區域實行封閉式管理，政府對該區的區長採取監控；區長對於管轄範圍內的小區負責人（社區管理者）採取管控；小區負責人組織志願者對居民施行行動限制，志願者為居民們進行登記與運送生活物資，他們是在小區中唯一可以自由活動的人，居民們除了每隔幾天就要下樓做的核酸檢測，其餘時間全部待在家中禁止外出；如若非常不幸，檢測結果呈現陽性，那麼病患將被直接轉移到方艙中接受治療，而同一個小區並未感染的人將會重複核酸過程，直至小區內再無陽性病例出現。

在這期間我們可以看到明確的控制與規範，從上至下的監視與管控也限制了人們的行動自由。上海居民不得不在家中遵守著政府下達的精神管控命令同時接受著社區管理者的實際行動限制，這是一種精神與肉體的雙重管控，好像如果不在家中待著，他們就有百分百被感染的可能性。

小區內的人、事、物與一切空間都在「全景敞視」中無處遁形，國家通過一層層的向下監控在疫情這個特殊的時期中達到了「合法管控」的目的，每一位居民都好像活在全景敞視建築中，在這個過程中，居民們不斷地適應著隔離生活下的規章制度，到點下樓做核酸、禁止外出，這成為了一場「全民隔離」，制度影響到了每一位居民，這種影響逐漸滲入到居民們的思維當中進而內化成為人的觀念與行為，此時的「小區」成了最好的觀察點，居民們在疫情中成為了被觀察的對象。

（二）權力的運作

在 Foucault 的理論中，我們可以把權力看作是一種關係。權力並不是國家與結構，而是在社會中的複雜策略狀況。當疫情來臨時，權力在如何實現「動態清零」這個策略上持續運作，達成了一種不平衡的狀態。在社會中，權力被具體化，它被掌控在國家手中，被稱為國家的權力，而國家運用這種權力來管控每一個渴望從封閉式管理中逃脫的人們，企圖達到他們所期許的「動態清零」，不惜用一座城的封閉來實現。在封閉式管理中，權力發揮了其「規訓」的作用，讓居民們習慣於被政策「管理」與「制約」，在這裡，權力體現為疫情期間的強制封閉管控與定期核酸檢測，連續的被要求行為形成一整套體制的統一運作。

疫情成為權力運作的「正當理由」，封閉式管理成為「保護」上海人民的防線。

Foucault 謂「知識就是權力」，在疫情期

間，普通人是無法精準地判斷疫情形態的，他們沒有相關的專業知識。而這時候，掌握著專業衛生專家成為了擁有支配權力關係的人，衛生健康委監督中心處長韓宏在接受採訪時說道：「要科學看待、理性看待集中隔離，集中隔離是切斷傳染病傳播途徑的有效措施之一，積極配合集中隔離就是為控制疫情作貢獻；嚴格遵守集中隔離有關規定，最重要的就是足不出戶，不擅自離開房間，不擅自傳遞物品，避免出現交叉感染」（黃揚子，2022）。可以說，知識與權力的相互支撐完整了封閉式管理的策略。

（三）「小區」在疫情中體現的空間特質

在前面我們已經講到，小區是人們追求私密性與安保性的存在。但疫情當下，小區為封閉式管理帶來了巨大的便捷，他們甚至不需要通過挨家挨戶貼封條的行為，只需要在小區的進出口設立關卡，就能夠實現一整個小區乃至一整個區域的封閉式管理。小區的人口登記信息也成為了便捷疫情期間的身份登記，只要有人沒有下樓做核酸，很快就能對照個人信息得到住在幾棟幾戶的個人資料。就小區的空間規劃來說，這種「封閉式」的空間區隔更有利於居民在疫情期間的「規訓」，能夠使國家掌控的權力在這個空間中發揮它的最大功效。而在這樣的政策下，小區的空間模式也讓疫情當下權力的滲透更加清晰，單位精確到每一棟樓里的每一戶。可以說，上海居民活在一個時刻充滿制度的空間場域中。

四、結論

疫情當下，上海防疫深入到「小區」的方式可以被視為全景敞視主義（panopticism）的再現，我們在這個過程中可以看到明確的權力的運作，正如邊沁所提出的原則：「權力應該是可見的但又是無法確知的」（Foucault, 1992）。人們在城市中安置的「家」，卻成為了「全景敞視建築」，疫情當下，上海居民承受著全景敞視主義的權力管控。

參考文獻

Foucault, Michel (1992) 〈全景敞視主義〉，《規訓與懲罰：監獄的誕生》（劉北成、楊遠嬰譯），台北：桂冠。

卫奕奕 (2016) 〈中國為何建那麼多封閉式社區？不只因為安全〉，《鳳凰安徽》2016年02月23日，(http://ah.ifeng.com/news/wangluo/detail_2016_02/23/4772261_0.shtml)，取用日期：2022年5月1日。

黃揚子 (2022) 〈專家：上海密接集中隔離轉陽率1至3成，應堅持動態清零〉，《上觀新聞》2022年04月19日，(https://m.thepaper.cn/baijiahao_17691325)，取用日期：2022年5月1日。

靈智爬蟲 (2021) 〈上海住宅小區數據清單列表、調查研究分析報表圖表報告〉，《靈智爬蟲》2021年12月27日，(<https://www.smartcrawler.net/fdg/d/181.action>)，取用日期：2022年5月1日。

▼上海市民經過被封閉管理的小區 來源 | 中新社



香港鼠疫和異質地方： 港英政府的太平山區防疫政策

◎ 撰文 高彤

前言

1894 年，香港爆發鼠疫，作為 19 世紀末「鼠疫第三次全球大流行」中的一次重要爆發地點，本次疫情共有 2500 多人喪生。疫情擾亂了原本居住在太平山區華人原有的生活習性，也使以中醫作主導的東華醫院的專業倫理受到質疑，改變了港英政府對華人的公共衛生及居住政策。本文旨在探討 Foucault 的異質地方 (heterotopia) 概念，以太平山區為例，其作為異質地方的作用及港英政府如何施展權力，以及東華醫院華人領袖面對疫情時的角色和權力關係。

太平山區：洋人眼中的異質地方

開埠初期，港英政府把城市建設集中於維多利亞城北岸，當時香港人口主要集中在今日的中西區。洋人居住於中環及山頂一帶；華人勞工則大多聚居在上環太平山區，但港英政府並沒有周詳規劃華人的居住環境。在 1894 年鼠疫爆發前，洋人對於太平山區一直視為異質地方存在著：其位處在華洋雜處的香港，只有華人居住的自我封閉區域。另外，由於港府大致依循大英帝國的殖民統治方針——不干預殖民地內原有民族的生活和習俗，所以沒有干涉華人的居住環境及衛生醫療習慣（崔永健，2015），但華人和洋人的生活習慣和居住環境大相徑庭。

這個異質地方一直存在各種衛生問題。華人的傳統衛生及居住習慣使衛生情況堪虞。如：倒夜香、人和家畜共居一室等。再者，華人居所採用背靠背方式興建，房屋之間沒有任何的空隙，使房屋的採光和通風情況差劣。過份擠迫的居住環境導致空氣流通不足（黃競聰，2015），華人居所的密度在沒有規管下，使疾病傳播率大大提高。加上太平天國之亂，大批華人陸續湧入香港，住戶擠滿在密密麻麻的新建房屋，環境擠逼。上述種種問題，使衛生環境日見惡劣，令太平城區成為了港英醫務官員眼中的恐懼地景 (landscape of fear)。這個異質地方卻在鼠疫前因無形的邊界劃定及原有政策，使華人一直相安無事，自成一隅生活在維多利亞城裡，讓港英政府內部意見不一。



▲前身為太平山街的卜公花園 摄影 | 高彤

鼠疫作為轉捩點：港英政府介入異質地方

1854 年，時任總醫務官的丹士達醫生 (Dr. J. Carroll Dempster) 呈交政府的報告中，多次對華人骯髒和惡劣的生活環境深表擔憂，提醒港英政府需要盡快採取果斷措施，否則會觸發疫症爆發：

我想道出數個我認為極其重要的課題，即排污、排水、通風及清潔……對於香港如此骯髒噁心，實在非常遺憾（渠務署，2019）。

可是，香港總督軒尼詩爵士 (Sir John Pope Hennessy) 對此持相反意見，並認為華人清潔乾淨：

無疑某些在港、加洲及澳洲的歐籍人士、往往抨擊中國人從不洗澡，是個骯髒的民族。事實上，說到重要的個人衛生習慣，中國人很清潔，即使低下階層人士也能樹立榜樣，實在值得我們的士兵和海員仿效（渠務署，2019）。

在港英政府呈交予英國政府的《香港年度行政報告》(Hong Kong Annual Administration Reports) 甚少提及惡劣的衛生情況，並認為香港的公共衛生情況一直有所改善（渠務署，2019）。

1894 年香港鼠疫的爆發，太平山區發揮了異質地方的功用，打破了港英政府一直以為行之有效的不干預政策想像，也打破了總督認為華人衛生良好的幻想，讓總督甚至

整個洋人世界意識華人真實居住環境的惡劣。

香港公立機構轄下的國家醫院主管醫生詹姆斯·勞森 (James A. Lowson) 調查疫情期間，前往了華人主理的東華醫院——所以中醫療法治療病人的醫院。在該處發現已有 20 名華人患上鼠疫，病況嚴重。據聞已有約 40 名病人死亡。這些死者大多來自太平山區（渠務署，2019）。經過調查後，病源來自老鼠的蚤，而惡劣的衛生環境是導致鼠疫大規模爆發的重要因素。

疫情嚴峻下，逼使政府改變對華人生活「不干預」的政策方針，轉以「規訓」(discipline) 的社會防疫政策，以分辨健康和患有鼠疫的華人。5 月 10 日，政府依據衛生條例，宣佈香港為疫埠，又引用《1887 年公共衛生條例》第三十二條，公佈一系列嚴厲的防疫政策，以「洗太平地」試圖阻止疫情蔓延，包括：所有市民皆有義務舉報鼠疫患者或可疑患者，可疑患者則要進行個案觀察；受感染地區的房屋水道和主要地下水道必須經常清洗及消毒；曾有感染個案的房屋必須消毒，其它傳染病也用同樣方式處理；所有病人的衣服一律要燒毀；東華醫院絕不可接收病人，以免散播疫病；必須在醫療船「海之家 (Hygeia)」接受西醫治療，以用作隔離病人（羅婉嫻，2018）。

從地區的公共衛生以至個人的家居環境，醫治方式到病人的私人衣服皆在管治、監控的範圍之內。上述這些構成了一種嚴密規訓華人的機制模式。政府訂下的條文用以對付瘟疫，逼使華人背離原有的生活習慣，使素來不重視衛生的華人要遵守社會的秩序並內化為日常生活的習慣，以杜絕是次鼠疫之亂。整個太平山區則由英軍看管，不讓華人隨處走動，傳染太平山區以外的市民，這正是以防疫為名圈禁華人的手段。上述各種政策可見港英政府建構了無形邊界的疫情治理，讓華人在太平山區的這面「鏡子」看見自身衛生惡劣的一面，令華人內部互相監察，族群自我排斥，沒患病的華人舉報鼠疫患者，從而照見自身的健康特質及覺醒自身族群的公共衛生情況，污名病患者。

▼ 舊東華醫院進口大堂 來源 | 高彤於 2019 年在荷李活道公園的告示牌拍攝



華人的反抗及終局

疫症爆發初期，搜屋、查證和清潔消毒的工作由潔淨局華人勞工承擔，工時長達十至十五小時，後期增派了港英士兵及印籍的衛生人員、警察協助防疫工作，組成了一支約300多人的清潔隊。可是，疫情日趨嚴重，連大量醫護人員也因為懼怕疫症而逃走，導致人手嚴重不足。這些政策上不可預計的人手編排失算，同時削弱了對華人規訓的理想機制。

另外，Foucault 對於權力的理解「有權力就有反抗」呈現於這次疫情之中。當時普羅華人抗拒入住「海之家」。加上，鼠疫死者被解剖屍體作研究，嚴重違反華人傳統觀念「死留全屍」。另外，各式各樣的流言，使患者寧願死在家中。除了一般華人外，東華醫院的管理層反對把醫院患者送至「海之家」，與港英政府的防疫政策背道而馳。其後雙方會談並達成共識，從中可見政府在實施「規訓」的防疫手段期間並不順利。而港英和東華醫院的華人領袖會談，反映典型港英政府和華人的權力關係。華人領袖作為統治階層與華人社會間的中間人，他們雖支持及維持港英政府的管治，但卻不是完全順從。在自身族群受到不公平對待時，仍會適時反抗，把華人的意見傳遞至官方耳中。隨著疫情持續擴散，太平山區由劃區隔離變為拆除居所，政府通過緊急條例收回該處土地，約7000名居民全部被遷出，港府清拆太平山區的大部份木構築物及樓房，並重新規劃該區，建成了一個以街市街至磅巷為界的新社區。太平山區作為一個疫區存在，在政府所建構的鏡像中需要清除。疫情過後，政府下令東華醫院須按照西方醫療衛生標準，改善醫院衛生情況，委任西醫、改革診治方法及設備。自此，東華的醫療服務漸漸以西醫為主導。

殖民政府為確保公共衛生的條件，介入及規管華人居住環境，遠超鼠疫爆發前的程度。太平山區初時作為異質地方，就如一面鏡子，是華人的日常生活，但統治者對華人的不了解，加上一直以來不干預政策和錯判，使太平山區介於華人的真實空間和統治者的想像世界之間。鼠疫看似橫空出現，誠然卻是這個地方條件下促成的必然結局，也顛覆了統治者對華人的美好想像。正如 Foucault 的異質地方，鼠疫揭示了華人地方的髒污且雜亂無章的居所環境。而這個異質地方也反映了華人領袖和政府的微妙關係及平衡。儘管太平山區拆卸，但卻長遠改變了政府介入對華人的公共衛生政策及醫療方針，由不干預及中醫治療的政策轉以西醫作主導及西方公共衛生思維的政策。

參考文獻

崔永健（2015）〈第三章：香港早期醫療衛生與管治〉，長春社文化古蹟資源中心，（<https://cache.org.hk/rthk/worksheet/ch03.pdf>），取用日期：2022/07/10。

渠務署（2019）〈第一章：香港開埠初期的發展及鼠疫爆發 1841 – 1894〉，渠務署，（https://www.dsd.gov.hk/30A_monograph/chapter_a1.php），取用日期：2022/04/30。

黃競聰（2015）〈疫患與社區：西營盤的香港治病與鼠疫〉，《鑑峰古今：香港歷史文化論集 2014》139-154。

羅婉嫻（2018）《香港西醫發展史（1842-1990）》，香港：中華書局。

Johnston, R. J., Derek Gregory, Geraldine Pratt, and Michael Watts (eds.). (2000). The Dictionary of Human Geography (4th ed.). Oxford: Blackwell.

異質空間— 大阪飛田新地與大和性史節錄

◎ 撰文 鍾智豪

一、前言

飛田新地組合料理（下稱飛田新地）位於大阪市西城區，原為組合料理館，但戰後變成町屋群妓院。從大阪地圖俯視，這個妓院是一個橫向長方形面積，中間畫了西南的圓弧線。雖然這裡可進可出，但四方都有意阻隔，東邊則是石圍牆圍住、南邊是大馬路、西邊則是飛田本通商店街、至於北邊則被新開筋商店街阻隔、最後腹地中間被阪神高速 14 號松原線（高速公路天橋）穿透。

二、異質空間作為方法

傅柯（Michel Foucault）為了串連現實和烏托邦的關係，以鏡子比喻提出異質空間的概念。簡單而言，異質空間就是我在鏡子看見自我、意識到理想的世界（反位址）、將視點拉回自身、最後反省和重構自己（傅柯，n.d）。傅柯認為人們對空間概念尚未脫離中世紀宗教的二元對立觀（例如公共和私人空間的對立），而人們亦需要重新認識空間概念—國家／城市位址之間的多重相對關係，並嘗試以空間特質去分類，而非像以往二元分立（傅柯，n.d），在這個空間分析的過程，異質空間（heterotopia）的概念是必須的。

本文會以異質空間的六大原則嘗試論證大阪飛田新地是一個怎樣的異質空間，同時，這裡如何發揮了異質空間的作用。



▲飛田新地與妓女 資料來源 | 許桂洋 (2018)

三、大和性史、自治遊廓

(一) 性和生產：自治遊廓的源起

遊廓是官方集中管理的妓院，政策源起慶長之年，但是遠古時代，日本已存在神道教的廟妓（巫女），她們不僅以祭事神，亦以性事人，如吳庭和徐德明所言「她們聆聽神諭，保家人富貴平安；侍奉賓客，祈集團『五穀豐登』。」（吳庭、徐德明，2015），性是人原始的生產能力，男性透過插入式性愛使女性生育，廟妓則將神力交給那個平民男性和其居住的土地，最後農地就基於男性的勞動和女性的神力（免於天神／天氣的災禍）可以「五穀豐登（吳庭、徐德明，2015）」。

對農民來說，面對待要開荒的土地，寺廟投射了一個就多子多福、生產力高的小農村；對貴族來說，面對各種國家問題，宮廟投射了一個人口高和穩定的國家；對軍人來說，性只是需要，亦沒有特定場所，除了軍人之外，對上層和下層階層來說，性既是慾望，又是一個走向一個美好社會不可或缺的儀式（但儀式和實際會否成功並沒有關係），妓院就是這個儀式場所。

根據異質空間的第一原則，妓院文化在世界各地文明皆有出現，但日本文化的廟妓文化有其自身的歷史脈落，是由廟妓—官妓—軍妓—遊女—「自由戀愛」為名目的妓女五部曲組成。但各地的妓院文化脈落仍有不同，故此以下先探討大和性史，補全歷史脈絡，然後討論飛田新地。

（二）性的物化和商品化：政府管理和禁止

繩文時代到大化革新時期，寺廟由自治模式漸漸轉為依附貴族，這個過程廟妓變成了貴族官妓，場地由寺廟和農地轉移到皇宮，性由原始生產變成禮制；然後平安時代到戰國時代頻繁的戰事使官妓變成了軍妓，妓女進入了世俗且變成軍需物資，能在戰地放鬆和振興軍心；後來江戶時代時期，穩定貨幣和商品化的社會運作使軍妓變成遊女，變成商業城市的服務業和商品（吳庭、徐德明，2015）、最後戰後日本政府為了保障民權，1958年立法禁止賣春（昭和每日，2009）。

現代大阪的飛田新地幫派為了避開「賣春防止法」（禁止插入式性愛）（昭和每日，2009），故此以「自由戀愛」的名目繼續賣春。這個過程，妓院從農地走上官場、再由官場下戰場、然後再經過政府有規劃管理和隔離（公娼制度）、最後戰後日本政府立法禁止賣春，幫派只好暗中重組妓院對抗法律。日本妓院隔歷史進程失落的現象—這種空間、政治和社會文化隨時間的轉化正正符合異質空間的第二原則—空間根據所在文化的共時性而作出改變。

日本在妓院世俗化的過程，人民失去了對性是生產的崇拜—妓女文化由地方信仰者的專利變成城市服務業，故此妓院的危機異質空間性質減弱了，同時，政府基於對性的不安而加強管制妓院，導致妓院出現了偏差異質空間的種子，亦導致戰後一度失去了這種異質空間。

四、飛田新地的異質空間和權力關係

（一）本土異質空間—重現江戶之美

江戶時代就是密密麻麻的和式木製開間式建築群、夜和燈火（李志銘，2020）、穿著和服男性滿佈街道、女性在房子裡等待、直接式且神意式性愛；沒有現代主義建築提倡的「水泥、鋼筋、玻璃」的阻隔式房子和密封的公共的街道、沒有圓領便服、沒有燈光、間接式和商業式性愛。

而飛田新地就是介乎兩者之間的異質空間，大量的和式木房連體式外牆配上寥寥數間的水泥屋和停車場；內部的町屋保留了完整開間式的室內空間，但同時裝上了冷氣機，並外露於屋外；保留燈籠但以燈泡代替了火燭，保留招牌的和式料理的



字樣和字體，但是轉了發光招牌；廟妓的神力轉化為「自由戀愛」（自由與不同女性的性愛）的價值。飛田新地古代和現代空間、文化、社會角色的矛盾就呈現了異質空間第三原則的面貌。

飛田新地是一個多重的異質空間，對於日本城市生活的男性來說，他們鏡像反映的畫面是一個臨時的心靈居所，除了性服務，單身男子暫時擁有一個伴侶和町屋為家；對於已婚男性，這裡則是一個逃避家庭壓力的避風港，妓院作是冷漠城市的一點溫暖。

另一方面，飛田新地投射了以前的江戶城市生活—東方異國情調，這是外國人進入日本的窗口。二百年前，日本浮世繪引起了外國對日本主義（Japonisme）的



▲江戶時代的繁華 資料來源 | (李志銘, 2020)

關注；今日，外國人到飛田新地一遊，亦能看到浮世繪畫像內的東方景象。雖然這只是一種飛田新地的商業服務，但這個異質空間裡，大家都能各取所需，旅客可以走走街道或使用服務去體驗心中的國度。

(二) 異質空間的矛盾性和轉變

身穿著圓領便服的男性走在街頭，媽媽桑和情趣服裝的妓女則打開門口，坐在玄關，媽媽桑呼喊，妓女在揮手，一來這符合男主外，女主內各安其位的佈局；二來，開間式房方一打開門就和街道連接，再沒有公共和私人空間二分，成為一個飛田新地互通的小宇宙，男方只要按服務時期付費（最多一小時）就可以短時間成為嫖客，盡情遊覽小宇宙和女性的深處（事後亦可以飲茶、食糖、聊天，保留著儀式感）（許桂洋，2018）飛田新地的角色轉換過程和時空限制既保留傳統空間和相處文化，同時打破空間二元的傳統觀，亦符合異質空間的第四原則。

還有，身穿水手服、性感泳裝、連身裙等性感的妓女和質撲和屋（許桂洋，2018）的性質既矛盾又互補，將男性的獸慾都收在一個端莊的密封、優雅小木箱。上面提到一男兩女、一屋一街的開透佈局當中亦有現代性，男性是消費者、兩女是服務者、一屋是分隔聲音的租用商品，這有別傳統妓院是以單位去分隔空間，不介意木門的聲音外泄（永井義男，2022），但現代人為保護私穩規劃空間將聲音阻隔，可以看在這個空間反覆地開明和保守交替互動、但同時願意保護古今美好的價值——自由性愛和隱私權，這就符合異質空間第六原則。

上個章節提到政府因為性保守和保障一步步限制妓女工作範圍和工作方式，雖說立法管制確實確保了民權和使民眾生活免於風花雪月的困擾，但心底潛意識卻只認同性只

能和女友、妻子發生（準家庭和法律之下家庭），無視日本單身男子的性需求和場地（法律之下妓院只能打擦邊球，或者租一個無地方性的酒店性交），飛田新地的「自由戀愛」可以穩定了單身男性／寂寞男性的性需要和內心的不安感。從日本單身男性的觀念和例子，可以看見比起戰前日本妓院，戰後飛田新地更進一步偏向偏差異質空間，解決社會需要。

（三）飛田新地鄰近空間的權力角力—民間和政府聯合、幫派

飛田新地的出入口十分隱秘，被飛田本通商店街、新開筋中央商店街、大馬路和石圍牆圍住。飛田本通商店街和新開筋中央商店街都是左右兩排兩層水泥房子、中間是鋼架玻璃三角長屋頂，作為市集，室內有如商場使人安心停留，引導前後兩面的行走方向，但亦因為這些市集集中和引導人流的特性，所以水泥房和三角長屋頂有意無意成為了阻隔飛田新地的高牆，亦跨耀著現代物料的優越感針對有個性的木建築群進行角力。

石圍牆的確可以進出，雖然牆身不高，但是需要沿著通道向上交錯才能上去，這個不便的設計有意避免牆上人走下去，牆下人走出去，至於大馬路很寬身，遠距的視野使飛田新地變的模糊，只見有一排排小房子在彼岸。當然，大馬路並不會為了飛田新地而設計，但是客觀上外面的行人不會有意去進入遠看已覺得平凡的空間；另一方面石圍牆這類的公共設施很難說得清楚是無為而設，這三面牆和大馬路的無聲角力使飛田新地的出入口變得隱秘，正正就是異質空間的第五原則。

飛田新地於鄰近空間之中孤立無援，而其腹地中間的阪神高速 14 號松原線橋下被西成警察署和山王連合振興町會（社區居民組織）所設的外牆阻隔，是一個隱密的空間，當中名目是用作警署停車場，外部則是綠化空間，但是實際上是警察對幫派的提醒—這裡並不然是無法之地，有警察在暗中監視，橋底就是政府式全景敞視主義（panopticism）的空間，同時亦提醒居民不僅生活在附近，亦是警察的耳目。

五、結論

從大和性史可以看見日本妓女文化隨時代改變，這個脫離野蠻的過程經常被稱為封建化和現代化。但矛盾的是，隨著日本文明前進，妓女文化卻愈來愈墜落，受人尊崇的巫女失去了地方（place），一步步變成商品。性的自由被政府閹割了（特定場地和自由行為），戰後沒有合法的妓院這類的危機異質空間，單身男子孤獨無奈嘆息之際，飛田新地作為偏差異質空間就誕生了。

飛田新地的出現就是為了對抗政府和民間的秩序。這種多重對抗呈現在基地和外部空間的開放和封閉對抗：江戶開間式互通內外的町屋群對抗現代化的物料和公私二元式空間；原治性自由對抗保守家庭和政府權力。在這個過程飛田新地呈現了傳統性文化延續和建築保存是可以中和現代文化的弊處，更可以共存。這個經驗值得為有志於開拓烏托邦的人們去借鑒。

參考文獻

永井義男（2022）〈《吉原花街裏圖解》：見習遊女「禿」除了打理日常雜務，也得學習高超的床技〉，關鍵評論網，檢自 <https://www.thenewslens.com/article/163612>。閱讀日期：2022年5月2日。

米歇.傅柯（n.d）〈論異類空間 Of Other Spaces〉（王志弘譯）(pp. 1-7)。
吳庭、徐德明（2007）〈日本神祇信仰下巫女至藝伎的歷時性研究〉，《日本問題研究》(pp. 55-62)，上海市：上海第二工業大學外國語學院。

李志銘（2020）〈浮世繪裡的女性形象（上）：「美人繪」，重現江戶紅燈區的繁花盛景〉，鳴人堂，檢自 <https://opinion.udn.com/opinion/story/12369/4418278>。閱讀日期：2022年5月2日。

昭和每日（2009）〈賣春防止法的執行〉，昭和每日，檢自 <https://web.archive.org/web/20140715120439/http://showa.mainichi.jp/news/1958/04/post-b29c.html>。閱讀日期：2022年5月2日。

許桂洋（2018）〈飛田新地破天荒大阪實拍 電視節目解構日本風俗聖地〉，香港01，檢自 <https://www.hk01.com/sns/article/245709>。閱讀日期：2022年5月2日。

我們的家園不是你的避難所： 以 Taromak 部落為例

◎ 撰文 葉王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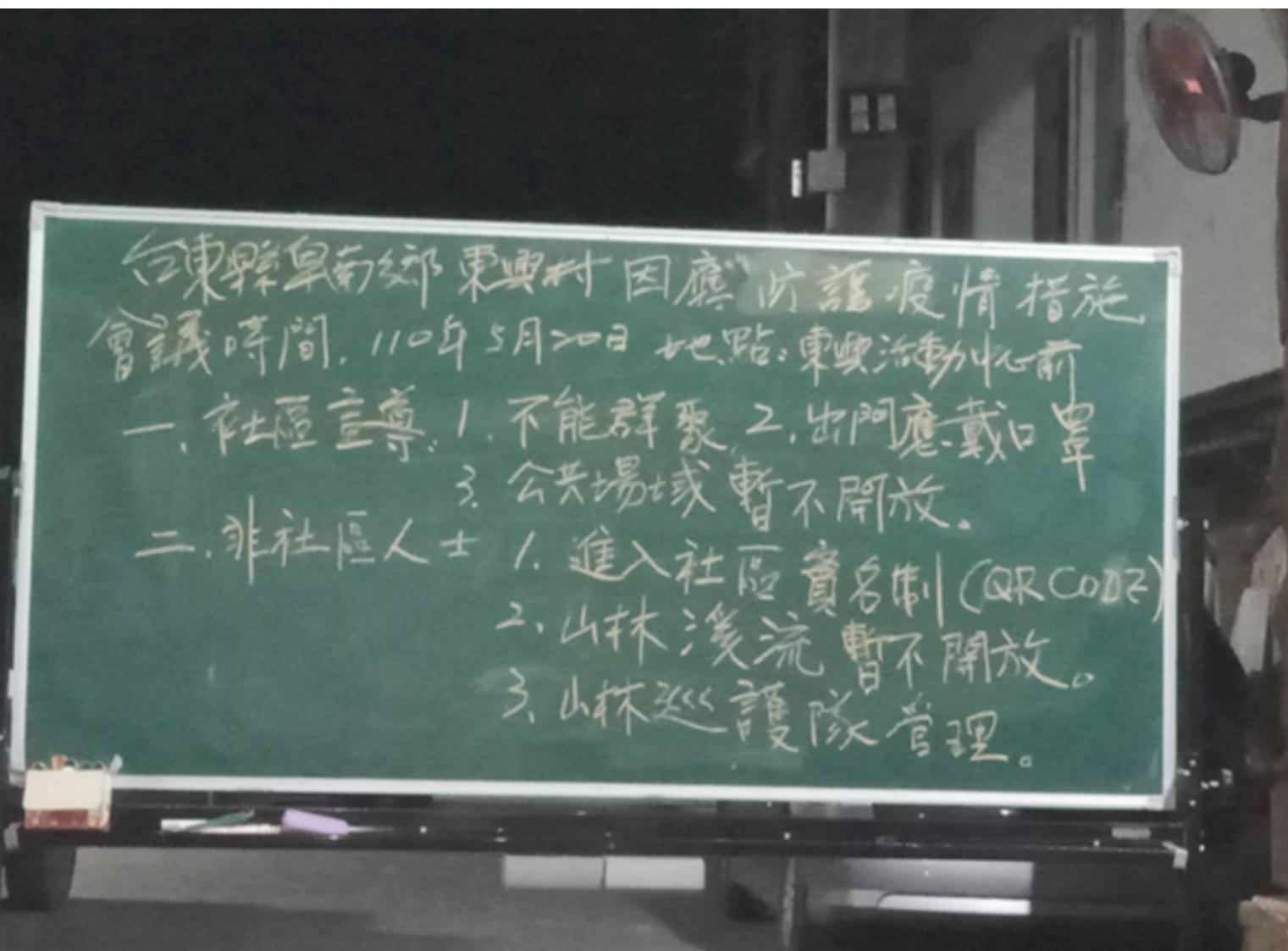


Shot on OPPO Reno5
By 1100522

▲達魯瑪克部落簡易檢疫站 來源 | 達魯瑪克部落族人拍攝

一、部落與觀光業者的衝突

2021年5月19日全臺升級三級警戒，Taromak 部落於5月20日晚間召開部落會議，做出以下決議：一、社區內宣導注意事項（1）不能群聚、（2）出門應戴口罩、（3）公共場域暫不開放；二、非社區人士注意事項：（1）進入社區實名制 QRcode、（2）山林溪流暫不開放、（3）山林巡護隊管理。同時自發性地設置簡易檢疫站進行部落邊境管制。不料就在邊境管制的第一天（5/21），即與長期經營臺東溯溪的旅遊業者發生口角衝突，該旅行業者表示部落此舉未事前公告且於法無據，試圖強行帶客通過檢疫站，但在部落青年人數優勢的狀況下，該業者只好打退堂鼓。雖然當下部落青年未與該業者正面碰撞，但此舉仍引發業者不滿，並揚言事後要訴諸法律途徑、申請國賠。事發第二天（5/22）晚上，業者到與部落會議主席、鄉民代表、村長及傳統領袖等社區幹部對談，在表明「和解」意願的同時，也希望部落賠償旅費損失。然社區幹部們一致回絕，表示防疫期間的必要措施並非針對業者，也強調部落已在5月21日當天行文公所備查。



▲達魯瑪克部落會議決議 來源 | 達魯瑪克部落族人拍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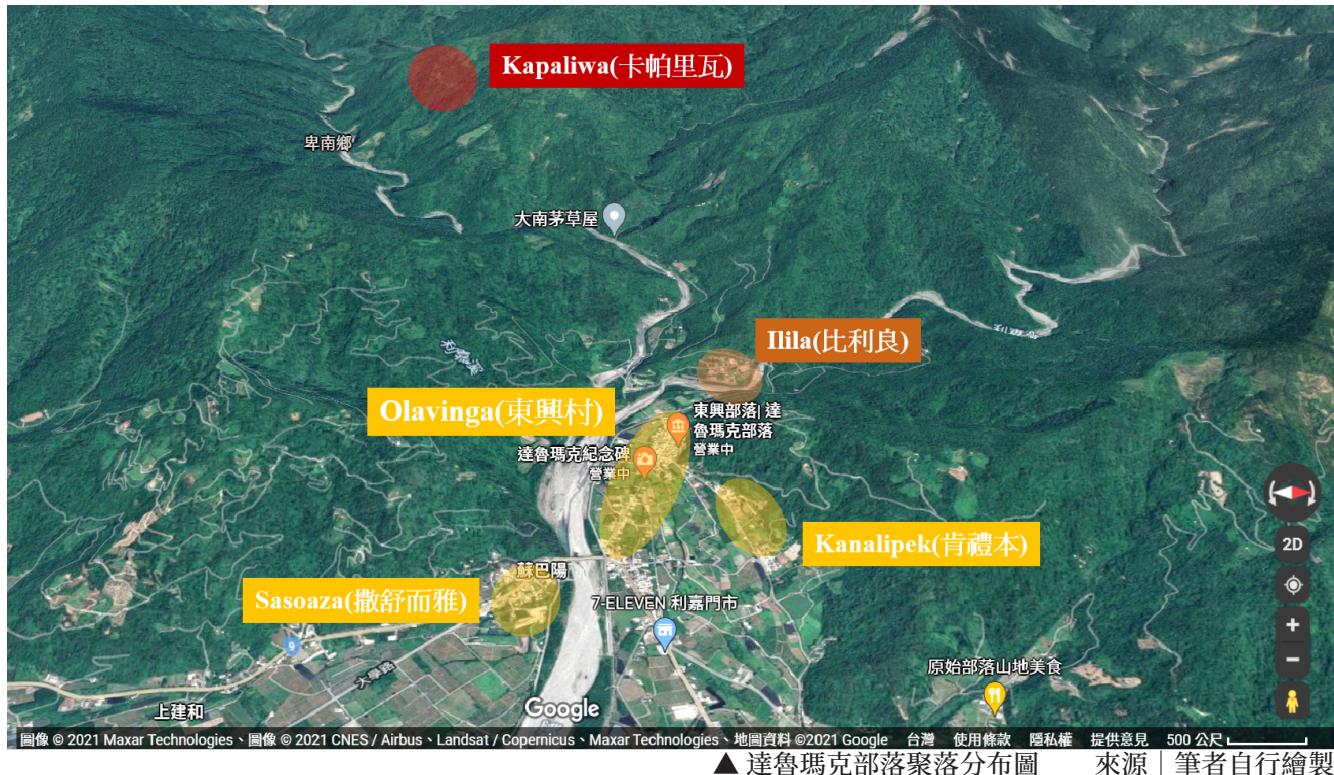
2021/5/19 下午	指揮中心宣布全台升為三級警戒
2021/5/20 晚上	部落召開會議討論防疫應對措施
2021/5/21 上午	部落設置邊境檢疫站管例 部落行文會議決議至卑南鄉公所
2021/5/21 下午	業者試圖帶客闖入而與部落發生衝突
2021/5/22 下午	台東縣府疫情說明記者會
2021/5/22 晚上	業者至部落與幹部們對談
2021/5/26 上午	原民會函請地方政府協助檢疫站
2021/7/12 下午	指揮中心宣布適度鬆綁 部落撤除檢疫站

▲達魯瑪克部落邊境管制衝突大事記 來源 | 筆者自行繪製

在媒體報導後，此事受到地方政府與立法委員的關注。臺東縣長直接於5月22日的疫情記者會上表明支持部落防疫行動，呼籲外縣市遊客能取消臺東旅遊行程；原住民族立委也公開肯定部落作為，指出關鍵在於部落公法人自民國104年三讀通過後，至今仍未有相關辦法，並向指揮中心喊話，應加強人流管制措施，或給予部落自主管理的彈性，避免原鄉地區淪為遊客躲避疫情的地方。此後，中央原民會於5月26日函請各地方政府，依據傳染病防治法，對轄內原住民族地區若評估有必要管制特定區域之交通，請報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辦理。同時發函給原住民族地區55個鄉（鎮、市、區公）所，如有需要可優先支用本會所補助之基本設施維持費。直至7月12日指揮中心宣布適度鬆綁部分措施後，達魯瑪克部落隨即撤除檢疫站。



▲ 簡易檢疫站分布圖與事件衝突點 來源 | 筆者自行繪製



▲ 達魯瑪克部落聚落分布圖 來源 | 筆者自行繪製

二、部落位置與族群智慧

現今的 Taromak (達魯瑪克) 部落位於臺東縣卑南鄉東興村，Taromak 一詞可拆作 Ta-romak 理解，Ta 表示「真正」，romak 表示「家」，合在一起表示真正的家，因此 Taromak 不只是部落，更是生命共同集合體。

面對著疫情延燒，部落除了採取國家公共衛生系統的「物質性」措施，也倚重文化信仰中「象徵性」的精神與科學以外的力量。例如在舊部落時期，Taromak 部落就曾因瘟疫爆發而遷徙。在日治時期因集團移住政

策遷徙到平地，定居祖先口中的瘴氣之地¹(圖六)，為了在「骯髒之平地」重新生存，每年收穫祭²都會舉行 wsaviki (封村除疫除穢儀式)，由傳統領袖帶領部落青年，透過傳統信仰的力量將不好的髒東西（包含病毒）逐出部落外。此外，我們也能從部落 2019 年的收穫祭的防疫指引，看見部落社群在疫情下，仍嘗試將族群經驗與知識進行物質與非物質性的實踐，找出合適、符合文化思維的各式調適策略，作為部落得以生存的安定與支持。

¹ 達魯瑪克的世界觀將世界分為三層，上層是 Babeleng(1500 公尺以上)，是祖靈居住的所在；中間是 Drekay(500 公尺至 1500 公尺)，是最適合人類居住的地方；下層是 Labelabe(500 公尺以下)，是多蚊蟲病害、濕熱不宜人居的地方。

² 收穫祭稱 kalralisiya，全名是小米收穫暨鞦韆祭，作為達魯瑪克部落一年當中最重要的歲時祭儀，通常舉辦時間為七月。收穫祭被視為是部落當年的結束與新年的開始。

三、部落能動性：自主檢疫行動中的組織動員

部落檢疫站的設立彰顯出地方的能動性，之所以能快速的動員與行動，除了疫情的壓力外，也有著部落社會組織—青年團在一線的檢疫執行。在舊部落時期，青年團是部落的軍隊，最重要的責任就是捍衛家園的安全及部落領域的完整；日治時期以降，部落面臨著強迫搬遷、河水氾濫、火災、颱風的重重逆境，青年團轉為災後重生的一大支柱。雖然在都市化與現代化

的衝擊下，許多部落青年早已旅外工作謀生，使得青年團的訓練與功能受到很大的衝擊及轉變，但在近年部落積極的文化復振下，青年團漸漸成為部落事務的一線執行者。因此，部落檢疫站在社區幹部、傳統領袖與青年團的共同努力下成立，並在部落會議授權下成立任務編制之「防疫小組」，擇一專人處理之中的溝通協調。

達魯瑪克 疫情防護

- 不群聚
- 出門戴口罩
- 進部落實名制
- 不開放外人入境

守護部落靠你我！



▲ 達魯瑪克部落防疫指引
來源 | 達魯瑪克部落青年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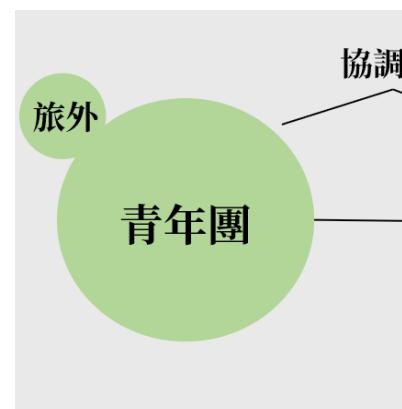
四、政府失靈？部落與政府關係的再調適

有鑑於臺東長期被國人視為臺灣後花園，在當時雙北疫情尚未趨緩的情形下，部落決議落實邊境管制以利管控疫情衝擊，但與觀光業者的爭執恰恰凸顯出這些行動中的各種矛盾。

達魯瑪克部落的社群韌性，在疫情危機下有著強而有力的展現，包含部落會議於指揮中心公布後一天隨即召開會議討論，做出任務型編制之防疫小組以及針對社區內及社區外人士的注意事項；青年團有經驗的組織動員；族群文化中蘊含的智慧。部落自主檢疫行動被視為地方社群對災害適應的韌性再現，但就根本成因其實是地方治理的缺失，在中央及地方政府功能失靈

的情況下，部落不得不行動，其自主性固然源自社群韌性，但仍不宜過度浪漫看待。原住民族部落在現代國家發展歷程下，被都市成型、文化霸權等結構性因素邊緣化，使得地方資源與社會資源產生極大落差，是以部落缺乏對醫療、衛生、經濟、交通等之當代生活必備條件，生活在部落的族人下被成為各方面的弱勢，因此大多部落根本禁不起病毒的考驗，社群韌性雖作為達魯瑪克部落的疫情回應策略，但其具體展現僅限於邊境管制，且此管制的制度性之保障不足，遑論在實際執行時防疫資訊進用、醫療資源取得上仍有許多不足之處。

然而，中央指揮中心非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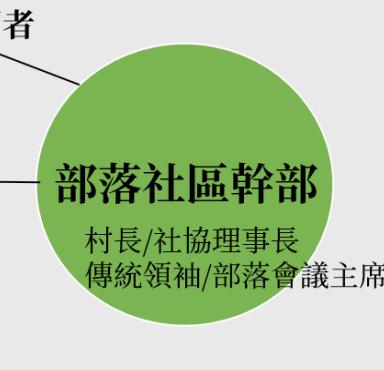


▲ 部落防疫小組組織概念圖
來源 | 筆者自行繪製

部落 復措



來源 | 部落族人古馥維 Cegaw 繪製



未考量賦權在地，善用部落能動性進行共同防災外，也未能回應原住民族社會既存差異化需求之思考，忽略了在既有結構下，地方、部落在防疫資源與資訊上的極度不對等情形。原民會的發函固然可視為

對既有制度下的修補性措施，在肯認部落自主防疫行動之正當性的前提下，給予臨時性的政策支持，但就此案後續的發展與觀察看來，其宣示意義大於實質協助³。可以說，這樣的臨時性修補僅能治標，對於根植於結構困境的資源與資訊不充分仍無法有效應對。以此案例而言，若要有效回應身為地方治理末梢的部落，治本之道可以分為三個層次。第一是指揮中心在規劃、執行防疫公衛政策時，要意識到國家內部族群、階級差異並調適其權力樣態。如在指揮中心決策

中納入族群代表、適度授權給地方政府並由地方政府賦權部落、社區提報自主防疫行動的規劃等；第二是盡速落實部落公法人相關法律授權⁴，賦予部落地方自治權力行使的正當性，才可能促使舉行文化祭儀活動時所頒布的防疫指引具有強制力；第三是身為年輕世代的原住民族青年可肩負資訊傳遞與轉譯的責任，善用青年組織的力量與青年本身的行動力補足既有的社會落差與排除。

³ 達魯瑪克部落並沒有因此公文發布，而獲得鄉公所任何幫助，地方說法是實際行政執行配套沒有指引，難以落實。

⁴ 部落公法人係依據《原住民族基本法》第二條第四款，是民族自治的重要基礎。惟該子法遲遲未有後續推動。